



D u r k h e i m i s D e a d !

阿瑟·伯格学术荒诞小说系列

涂尔干死了!

社会学理论另类读本

[美] 阿瑟·伯格 著
曹雷雨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作者又出新作！

来自19世纪和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杜波依斯、涂尔干、弗洛伊德、齐美尔、比阿特丽斯·韦布和马克斯·韦伯在出席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在会前的一个晚会上，发生了学者斗殴、珠宝失窃、涂尔干失踪等一系列可怕的案件，杰出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和他忠实的搭档约翰·华生博士介入了这群社会学家，展开调查。社会学家们纷纷向福尔摩斯讲述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并展开了激烈争论。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精神分析等社会学流派在这里激烈交锋，充满了智慧、思想和幽默。终于，这场扑朔迷离的案子真相大白……

ISBN 7-5633-6176-6



9 787563 361762 >



北京贝特

ISBN 7-5633-6176-6/I·762

定价：13.00元

阿瑟·伯格学术荒诞小说系列

涂尔干死了！

社会学理论另类读本

[美] 阿瑟·伯格 著
曹雷雨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Durkheim is Dead! Sherlock Holmes Is Introduced to Sociological Theory

Arthur Asa Berger

Copyright © 2003 Arthur Asa Berg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5-09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涂尔干死了!:社会学理论另类读本/(美)伯格著;
曹雷雨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阿瑟·伯格学术荒诞小说系列)

ISBN 7-5633-6176-6

I.涂… II.①伯…②曹…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350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5.5 字数:101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1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作者前言

《涂尔干死了!》是一部推理小说。小说的主线围绕着杰出的私家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和他忠实的搭档约翰·华生博士展开。和许多推理小说一样,它也是一部思想小说,这些思想来自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最重要的几位社会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们是(以字母为序):W. E. B. 杜波依斯、埃米尔·涂尔干、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拉基米尔·列宁、格奥尔格·齐美尔、比阿特丽斯·韦布和马克斯·韦伯。

我是怀着极大的乐趣来写这本推理小说的,希望它不仅能使您开心,而且能对您有所启迪。请相信,要让成文于上个世纪之交的社会学理论味美可口已非易事,让它在 21 世纪被人消化吸收更是难上加难。但另一方面,社会学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人之为何所以为的问题,问题本身颇为引人入胜。希望您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欣赏不同人物的惊人智力,也能领略他们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奥秘所阐发的深刻洞见。

通过此书,您将会了解到官僚体制、失范行为、自杀、

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权力、魅力、阶级斗争、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女权主义思想、信仰和价值的力量、种族问题、集体抗议的力量、象征等。

我撒了一张大网，把传统社会学理论课程中认为比较次要的几位思想家也囊括了进来。这是因为我想在书中涉及女权主义思想（这正是比阿特丽斯·韦布出现在书中的原因）、弗洛伊德的思想（关于精神和社会现象，他的确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有趣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列宁的身份出现，因为马克思本人在故事发生之前已故）。同时，我还要讲一个与社会学理论有关的故事，而这又引出了下面的问题：谁会出现在故事中，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会提出这类问题。

读完这本关于社会学理论这一有趣而重要的主题的书，您可能会发现您对自身在世间万物之中的处境的看法，以及您对自己的种种可能性的想法从何而来。

我在书中有些地方采用了相关理论家和他人著述中的一些重要片段作为对话，以便尽可能准确无误地捕捉他们的思想并向读者展现他们的写作风格，而这也正是有些段落语言古旧拗口的原因。有不少地方需要做些改动，以便更具有可读性。

我不仅参考了书中相关社会理论家的作品，还借鉴了以下著作：刘易斯·科泽尔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亨德里克·M·鲁伊滕贝克的《经典社会理论荟萃》以及彼得·贝尔热和布里吉特·贝尔热的《社会学：一种传记方法》等。

我想对那些此书手稿的评议者表示感谢,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他们提出了许多非常有用的建议。此外,我还画了若干插图以使本书更具视觉上的吸引力,正文后面附了重要术语表。

[说明:为忠实于历史,我在文中用了“黑人”(Negro)一词,因为那是故事发生时代的惯用词。本着反映真实的目的,我采用“man's progress”来表示人类的进步(human progress),讨论了诸如妇女争取投票权这类问题,但没有涉及妇女在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中的平等这类当下的问题。]

鸣 谢

同我写的很多书一样,本书的写作也肇始于我和 AltaMira 出版社社长米奇·艾伦在中国餐馆的一次谈话。我告诉他,我的《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大众传播理论另类读本》(以下省称为《学术会议上的惨案》)终于要付印了,这让我备感欣慰。起先,我把《学术会议上的惨案》一书的手稿给了他,但因为他不出版大众传媒方面的书籍,于是转给了 Rowman&littlefield 出版公司的编辑布伦达·黑登费尔特,我曾在他那里出版过一本广告方面的书。我要补充一下,AltaMira 出版社是 Rowman&littlefield 出版公司的分社。

我对米奇说:“我正琢磨着再写一本谋杀推理小说,原想写一本社会学入门读物。”

“不行,”他说,“你甭想写一本社会学方面的推理小说……关于社会理论是可行的。为了呼应你那本有关后现代理论的推理小说《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他竟然大胆地出版了),还有那本传播理论方面的推理小说,再写一本理论书吧!”

“我想你指的是经典社会理论家，”我说，“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涂尔干、弗洛伊德……你是这样想的吗？”

“对，”他说，“我们还应该有一些女权主义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内容。”

“唔，”我想，“有何不可？”

我有充分的理由把米奇称作“伟大的拒绝者”，因为在我以往所写的书中，他只出版那些他建议我写的。

“我想到一个书名，”我说，“《涂尔干死了！》(*Durkheim Is Dead!*)。印象如何？”我喜欢给我的推理小说冠以押头韵的书名。我的另外两部推理小说分别叫做《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Postmortem for a Postmodernist*)和《学术会议上的惨案》(*The Mass Comm Murders*)。

“就是它，”他说，“就是它。《涂尔干死了！》。写一本夏洛克·福尔摩斯推理小说吧。”他又道。

我的所有推理小说都以旧金山警察局的所罗门·亨特探长作为首席侦探，我原想再用他一次，既然米奇提议写一本夏洛克·福尔摩斯推理小说，那么夏洛克·福尔摩斯推理小说就正是他想要的。此外，我想试着写一本夏洛克·福尔摩斯推理小说也会其乐无穷。

正好，我曾一度读过不少社会理论，并且收藏了很多社会理论家的著作。我还在州立旧金山大学图书馆和米尔谷图书馆查阅了其他书籍。书后的“术语汇编”和我为《传媒与传播研究方法》一书所列的那份基本相同，但也有多处改动。

事实上,1910年左右,马克斯·韦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拉基米尔·列宁、格奥尔格·齐美尔、埃米尔·涂尔干、比阿特丽斯·韦布和 W. E. B. 杜波依斯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全都在世并且处于智识的高峰期。我们看到,那一年:

W. E. B. 杜波依斯 42 岁

埃米尔·涂尔干 52 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54 岁

弗拉基米尔·列宁 40 岁

格奥尔格·齐美尔 52 岁

比阿特丽斯·韦布 52 岁

马克斯·韦伯 46 岁

在他们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相互谋面是完全可能的。可以想见,他们会在故事的发生地伦敦的一次会议上相遇。(查阅首位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和作家比阿特丽斯·韦布的日记,可见她似乎见过每一位到过伦敦或伦敦附近的名流。)

至于在我写下故事中的事件之前,他们是否有幸结识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及其搭档华生博士那便纯属猜测了。

目 录

作者前言

鸣谢

| | |
|-----------------------------|-------|
| 人物表 | (1) |
| 第一章 那天下午,我处理了一个病人 | (7) |
| 第二章 她离开之后…… | (17) |
| 第三章 我正要离开福尔摩斯的公寓 | (23) |
| 第四章 翌日凌晨,我正打算…… | (35) |
| 第五章 我和福尔摩斯一大早就赶到了 克拉里奇饭店 | (43) |
| 第六章 马克斯·韦伯敲了敲我们的房门 | (50) |
| 第七章 我们正等着会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64) |
| 第八章 我们约见的第二位教授 | (80) |
| 第九章 克拉里奇饭店最后一轮午餐时间 | (92) |
| 第十章 我们访谈的下一位是…… | (107) |
| 第十一章 敲门声让我们吃了一惊 | (114) |
| 第十二章 莱斯特雷德的手下…… | (119) |

| | | |
|------|--------------------------|-------|
| 第十三章 | 我们离开询问赴宴者的房间 | (127) |
| 第十四章 | 比阿特丽斯·韦布在克拉里奇饭店 举办的晚会 | (137) |
| | 术语表 | (144) |
| | 参考书目 | (157) |
| | 作者介绍 | (162) |
| | 译后记 | (164) |

人物表

夏洛克·福尔摩斯

他是久负盛名的私家侦探,因为具有惊人的观察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善于侦破迷雾重重的疑案。他也是个超然而傲慢的人。他侦破的最著名的案件有“血字的研究”、“巴斯克维尔猎犬”和“四签名”等。他不仅聪明机智,而且还是个音乐天才,拉得一手好琴。如今,他卷入了一系列纠葛之中,这关系到一些来伦敦参加题为“社会进步的前景”国际会议的社会思想家,检验他那过人的智慧和推理能力的时刻到了。

约翰·华生博士

他是福尔摩斯的好友和搭档,曾参与侦破福尔摩斯接手的大案。福尔摩斯时常占用华生大量的时间,他总是处之泰然。他的医学知识和那把可靠的左轮手枪往往能在福尔摩斯的案件中派上用场。他是福尔摩斯诸多冒险经历的讲述者,给我们展示了福尔摩斯行动中的惊人

智慧。事实上，他对犯罪的本质及其与生物学和神经学现象之间的关系有一套有趣的理论。

马克斯·韦伯 (1864—1920)

他在德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中任社会学教授，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思想家。他对“理想类型”、新教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该领域尽人皆知，他有关官僚制在社会中的作用、社会中现存的不同类型的权威以及这些权威形成过程的理论同样很知名。

他于 1897 年精神失常，患有抑郁症多年，身心饱受折磨。后来，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动笔完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多部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

玛丽安娜·韦伯 (1870—1954)

她是马克斯·韦伯的妻子，婚前名为玛丽安娜·施尼特格，于 1893 年 22 岁时同韦伯结婚。她的丈夫是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家之一，她也是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著有《婚姻中的权威与自主》、《女性与客观文化》和《新女性》。她由于在女性研究方面的建树被海德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埃米尔·涂尔干 (1858—1917)

他是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以其旨在区分宗教

与世俗领域的杰作《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以及有关失范、越轨和自杀的理论而闻名。他认为,失范是对个体赖以发现自我的社会结构的反映,不仅仅是一种心境。他还指出,人际关系协调的社会比人际关系疏远冷漠、无章可循的社会自杀率偏低。他被公认为法国首位社会学家和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的创始人。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

他是马克斯·韦伯的好友,是一位有独创性和广泛影响的社会学家,他有关文化现象、社会关注、时尚与休闲以及空间与时间的研究深得学术界的关注。他强调了不断互涉的个体间交往的重要性以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他说,社会是“因交往而联结的诸多个体之名”。韦伯为他争取他应得的教授职位未果,原因在于他是犹太人,成了当时盛行于德国大学中的反犹太主义的牺牲品。

弗拉基米尔·列宁(1870—1924)

他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一位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和政治人物。他相信,社会存在着阶级冲突,需要暴力革命。他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对共产主义革命必将发生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做了修正。他认为,革命能够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完全可以充当革命的候选国。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以后,要让共产主义精英掌权并且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确保革命成果。他还强调了帝国主义的角色，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的问题输出到不发达国家并对其进行剥削。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他是一名医生，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建者，对社会和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他认为，人的精神具有无意识，其重要性在于它造就了我们的行为，然而人们在一般状况下难以接近它。他把精神分为三个部分：本我，用以表示我们的欲望和冲动；自我，用以监控我们周围的环境；超我，类似于良心。正如他所言：“只要有本我，就会有自我。”他不仅对个体心理学感兴趣，还关心群体心理学，并且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个体行为。他所写的有关社会现象的著作有《文明及其不满》、《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等。

W. E. B. 杜波依斯(1868—1963)

他是一位国际知名人士和当时最有影响的黑人学者之一。1895年，他成为第一个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黑人，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禁止非洲奴隶贸易问题。他认为，阶级和社会结构是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他还指出，种族主义是当前的核心问题，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非同寻常。“20世纪的问题是种族界限问题。”他说。人们认为这种思想很激进，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证明

种族冲突尽管不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唯一问题,却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比阿特丽斯·韦布(1858—1943)

她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与著名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悉尼·韦布结为伉俪。他俩是最重要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在现代工业主义社会中,贫穷的根源在于生产手段的私有和以工人为代价的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的欲望。她同丈夫合作针对贫穷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并著书立说。她和悉尼·韦布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创办者。她曾一度反对妇女拥有选举权,后来又改变了初衷,她晚年作为妇女利益的捍卫者闻名于世。

塞西莉·布拉克内尔夫人

她的已故丈夫欧内斯特·布拉克内尔勋爵是一位富有的工厂主,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并用这笔钱创办了一个基金会,旨在帮助穷人和其他公益事业。她也是比阿特丽斯·韦布的好友,应后者之邀参加一个为社会理论家举办的晚宴,结果,他们中有不少人已经向她掌管的基金会递交了资助申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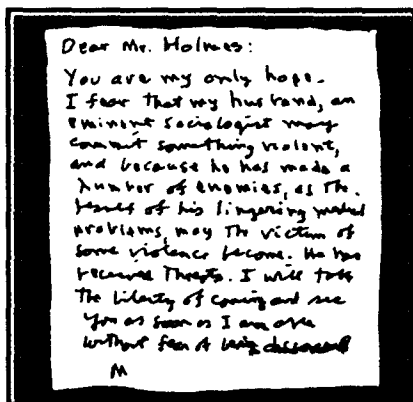
导致利己主义型自杀的原因为：自杀者再也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利他主义型自杀则是由于：在自杀者看来，继续生存的理由好像处于生命自身之外；已经为我们所确认的第三类自杀的原因在于：自杀者的行动无章可循并反受其害。最后一种类型因其缘由可称作失范型自杀。

诚然，失范型自杀和利己主义型自杀并非截然不同，两者都是因社会存在对相关个人来说不够强大所致，但社会缺失在两者之中所涉及的范围却不尽相同。对于利己主义型自杀来说，具体的集体活动丧失了对社会的要求与关注，致使该活动既无目的亦无意义……以上两类自杀尽管相似，但仍然有别……两种类型的自杀者各自所拥有的社会背景不同：前者主要位于知识领域即思想界，后者则置身于工商界。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与失范》

第一章

那天下午，我处理了一个病人



那天下午，我处理了一个病人。后来，我碰巧来到老友夏洛克·福尔摩斯所在的贝克大街公寓附近，于是决定去拜访他。我想祝他新年快乐，因为新年在即。我见福尔摩斯坐在他那把天鹅绒扶手椅上，身边小桌上堆着一大摞报纸。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他对报纸异乎寻常的兴趣让我猜想到他在着手调查什么。他正在吸烟，这是他有思想重负的惯常表现。

“欢迎你，我亲爱的华生。”他说道。他看起来心情很

好。我注意到他的那把小提琴搁在身边的桌子上。无疑，他刚拉过不久。我不具有福尔摩斯那种出色的观察分析能力，但察觉这一点并不难。看到周围没有注射器或毒品，我松了一口气。真是个好兆头。

“我来这里祝你新年快乐。”我说道。

“谢谢你，亲爱的华生，”他应道，“见到你真好。自打你结婚后，我就不敢随心所欲地找你了。对我来说，你每次来都是莫大的乐事。”

“我不想影响你的工作，”我说道，“你要看这么多报纸。”

“从报上能得到很多信息，”福尔摩斯说，“当然，你得会读才行。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报上废话连篇，有时候还是挺有用。”

“你有新案子吗？”我问道。

“对，”他说，“有人和我联系，是件很棘手的事。”

“总是这样。”我应道。

“瞧，”他拿出一张淡蓝色的小纸片，“你看看。”

我接过纸片，是一封信，字体清秀，便读起来。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您是我唯一的希望。我的丈夫是一位有名望的社会学家，近几年他遇到了不少麻烦，我担心他会有过激行为。此外，他四处树敌，再加上所患的精神疾病尚未痊愈，他可能会成为某种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他已经受到了威胁。在不用担心被人发觉的情况下，我会冒昧地拜访您去。

M. W.

“华生，你的推断是什么？”福尔摩斯问道，“你了解我的方法。试试吧。”

“我不清楚……这位女士很害怕……她担心丈夫会对某个人做出可怕的事……我想他的情绪不稳定……他也可能成为某个敌人的攻击对象。看起来，处理此事需要非同寻常的手段，”我说道，“所以她才会给你写信。”

“信是今天早上差人送来的。”福尔摩斯提示道。

“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没法知道信来自哪里。”我说。

“来自伦敦，”福尔摩斯说，“这一点确定无疑。人们只在伦敦市内派信差送信。信纸不是英国所造。上面有一个淡淡的水印，出自一家德国文具商行，是个花体的‘B’。这是柏林一家很有名的文具商行——布卢门科尔商行的商标。纸质相当好，表明这位女士所嫁之人财力可观。但纸色有变，可见信纸是旧的，写便笺的女士和她丈夫在经济上可能遇到了问题。此外，再看信中的句子结构，动词很别扭地位于句末，这说明写信人的母语是德语，英语是她的第二语言，说不定是第三语言。写信人署名为‘M. W.’，看来她有顾虑，她想在信件内容万一公之于众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证没人知道或发现她将求助

于我或正求助于我。我的好华生，她对此无需担心。尽管信中语气急切，但她还迟迟没有露面，说明她顾虑重重。”

“她会不会不露面？”我问道。

“不会的，”福尔摩斯自信地说，“事实上，我想她十分钟之内就会坐在这间屋子里。”

“那我得告辞了，”我说，“我不想干扰你的案子。”

“别走，华生，你得留下来。在这个案子里，你的专业知识会对我帮助很大。你要是愿意，就请从窗户里往下看，看看贝克大街，告诉我看到了什么。”

我走到窗口，透过百叶窗向外看。福尔摩斯的住所贝克大街 221 号乙的街对面，有一位女士。她身着漂亮的深蓝色套裙，戴着帽子和薄面纱，正在朝福尔摩斯公寓的窗户张望，同时还紧张地摩挲着手中的袖珍书。

“有一位女士，”我说，“时不时地瞟两下你的窗户，还紧张地摸着手里的书。”

“我想她在作决定，”他说，“半个小时以前她就在那儿了，肯定是想鼓起勇气来见我。她很快就会不顾一切地进来。”

福尔摩斯说完这些话几分钟之后，有人轻轻地敲门。我过去打开门，穿蓝色套裙的女士正站在门口。

“我可以进来吗？”她问道。

“当然可以。”我说。

“请您原谅，福尔摩斯先生。”她对我说道，略带德国

口音。透过面纱，我能察觉她脸上痛苦的表情。“我急需得到您的帮助。”

“我是华生，”我答道。我转身指了指夏洛克·福尔摩斯，他已经过来招呼这位女士了。“这位就是您要找的人，我亲爱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

“请您原谅，”她边说边摘下了帽子，“我不是英格兰人，我只是听说过夏洛克·福尔摩斯的鼎鼎大名。”

她面色苍白，身体微微颤抖，好像随时都会跌倒。

“请坐，韦伯夫人。”福尔摩斯边说边示意她坐到沙发上。

“谢谢。”她声音微弱地说，随后坐了下来。福尔摩斯坐在她近旁。

“我怕……我怕我会晕倒。”

“想喝茶吗？”他问道。“我让房东备点茶。”

“不喝……不喝，谢谢您，”她说，“我的时间不多。”

“我理解。”福尔摩斯说道。

等她攒足了力气，平静下来以后，转身面向福尔摩斯。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她问道。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谈论即将召开的以‘社会进步的前景’为主题的会议，有些报道谈到了要参加会议的重要学者，除了学者本人的名单，还有他们妻子的名字。您的信纸上有一个德国水印，您又署名为‘M.W.’，毫无疑问，您就是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教授的妻子。我拜

读了几本您丈夫的著作，很有兴趣，也读过您关于女权主义的文章。”

“我的丈夫……”她哽咽道，开始啜泣起来。

“别担心，韦伯夫人。我会帮助您的。您得多谈一些情况。”

“我的丈夫，”她说，“多年来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去西班牙度假。就在去旅行的几个月前，我的丈夫同他父亲之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争吵，争吵过后没几周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从西班牙返回的途中，马克斯突然开始发烧，并且持续了一个月。后来病情有所好转，但又陷入了极度的抑郁，不仅就精神崩溃了。后来的五六年里尽管状况改善了许多，但始终没有完全康复。他非常忧伤，福尔摩斯先生。非常忧伤。我要补充一句，他的病情并非尽人皆知，我们一直想方设法保守秘密。他同校方达成协议，中断了教学活动。校方向来十分宽容，很支持他，决定等他有朝一日再续学术生涯。我担心校方的支持可能会减弱，甚至有可能终止。我们正在为经济问题想办法。一旦他由于某种情况不能重返教学岗位，我不知道我们会怎样。”

“他还在写一些东西，也承担少量的教学任务，但已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无法彻底摆脱抑郁状态，可怕的忧伤紧紧缠绕着他，叫他不得抽身。他也能做一些事情，但仍在病中。”

“我理解。”福尔摩斯说道。

“我们同其他社会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一道参加这个‘社会进步的前景’的会议，但开会只是此行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斯想得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帮助，他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为谨慎起见，他们将在明天为名人举办的晚会上见面。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将会出席，马克斯的老朋友格奥尔格·齐美尔也会到场。还有其他一些人，俄国政治作家列宁、黑人社会思想家杜波依斯等。我担心的是，马克斯要是发病的话他会干什么，或者有人会对他干什么。我们在德国已经受到过威胁。我的丈夫言谈相当直率，得罪了不少人。他有可能，我担心……对他人、对自己有暴力行为。我很害怕。”

“韦伯夫人，”我宽慰道，“您找对了人。要是有什么人能帮助您的话，那人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请放心，会有着落的。”

“在德国或伦敦，您曾经报过警吗？”

“我不敢这么做，”她应道。“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外界得知我可怜的丈夫的情况。此事一旦传出去，可能会毁了他的事业，甚至于毁了他自己。”

“是的，这我理解，”福尔摩斯说，“您是否能告诉我举办晚会的女士的姓名，还有举办的时间和地点这些细节？这对我很有用。”

“主办者是比阿特丽斯·韦布，地点在克拉里奇饭店，时间是明晚8点。”

“比阿特丽斯·韦布，那位女权主义思想家，”福尔摩斯说，“她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女人。多年来，我很赞赏她以及她丈夫悉尼所做的工作。”

“我想，大概有 50 人出席晚会，”玛丽安娜·韦伯又道，“召开会议地点也在克拉里奇饭店。届时，在中心舞厅由重要发言人作专题演讲。”

“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福尔摩斯说，“自打收到您的信以后，我一直在悉心读报。这次会议引起了新闻界极大的关注。世界各地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为此来到了伦敦。报上俯拾皆是关于这些思想家及其思想的文章，还有他们的照片。社会学这门新科学似乎前途无量。但是这些思想家之间诸多的分歧也让人颇为困惑。会议历时 5 天，或许到结束时我们能更多地了解社会进步的种种可能性，一些思想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相互冲突的思想和理论进行协调。”

“那可能就是进步。”我说道。

“请相信我，韦伯夫人，我会尽全力保护您的丈夫，让他不受到伤害，同时防止他伤害别人。”福尔摩斯又道。

“不知怎样谢您才好，”韦伯夫人说，“我会永远感激您的。”

“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您来过我这里。我和我的同事华生医生会见机行事的，重要的是，不得让人知道我们与此事有关。”

“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她说，“请相信我。”

“那就好，”福尔摩斯说，“您现在得回到丈夫身边，尽量好好照顾他。在会议上或在其他什么地方，如果您碰巧遇到了我或者华生，千万别表现出您认识我们。”

她站起身来准备告辞。“非常感谢您，福尔摩斯先生，”她说，“我肯定会报答您的。”

“亲爱的夫人，您就把这看作我个人对即将召开的会议的主题——‘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吧。”福尔摩斯边说边打开了门。

科学地研究价值判断不仅能够解释并移情地分析欲求目标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能够批判地“评判”它们。这种批判可能……只不过是对历史地赋予的价值判断和观念做出的形式逻辑判断,是根据欲求目标内在一致性之公设对理想所进行的检验……它能够帮助(行为者)意识到价值的终极标准,他自己对此尚不明了,要么就是为了具有逻辑性他必须预设这些标准……至于说这些价值判断的主体是否应该遵从这些终极标准则是他个人的事情,这牵涉到意志和良知问题,而非经验性的知识。

——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方法论》

第二章

她离开之后……



她离开之后，福尔摩斯又坐回椅子上，神情异常坚定。

“我对那个可怜的女人深感同情，”他对我说，“她的负担很重。一个人的思想突然出了轨是件可怕的事，我担心她丈夫的境况会十分危险……危险可能来自他人，更可能来自他自己。请原谅，华生，我要思考一会儿，一边拉琴一边思考。你可以看看我买的报纸。”

随后，福尔摩斯拎起他的小提琴，凭记忆拉了几节维

瓦尔第的曲子，我利用这段时间读起了报纸。关于参加会议的许多著名而颇具争议的教授和思想家，如弗拉基米尔·列宁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报上文章一篇接一篇，他们将在未来五天发表演说。福尔摩斯在必须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往往都要拉一阵子琴。一节悦耳动听的曲子刚拉了一半，琴声戛然而止。

“华生，”他宣布说，“我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我要安排我们出席克拉里奇饭店的晚会。”

“可是，福尔摩斯，我们没接到邀请。”我提醒他。

“不是去做客，华生。我们要帮着接待客人。克拉里奇饭店的老板过去曾得到过我的帮助，让他安排我们充当他的雇员应该不成问题。当然，我们要化化装。韦伯夫人不会泄露我们的身份，但其他人可能会认出我们。请记着带上你的医药包和那把可靠的左轮手枪，尽管可能一样也用不上。与会的发言人相互打得很厉害，但目前也不过是打打嘴仗罢了。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韦伯教授精神方面有问题，也可能会有什么狂人或罪犯打算行使暴力。”

“我们何时去克拉里奇饭店？”

“6点整，”福尔摩斯应道，“此前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能否斗胆问一句，是什么样的工作？”

福尔摩斯宽容地笑了。“亲爱的华生，我们正在跟一群智力非同寻常的男男女女打交道，要是报上的文章说

的没错，他们已经在社会学这门新科学及相关领域内写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著作。要同理论家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理论是个好办法，这样就可以获知他们的动机以及在韦布夫人举办的晚会上会发生什么。因此，我要去皇家图书馆拜读一下这些可敬之人所写的书，我也会在书店买一些。由于对此感兴趣，我手头已有好几本了。”

“真是个好主意，福尔摩斯。”我说道。

“理论总是有助于弄清楚理论家，”福尔摩斯教导我说，“当然，亲爱的弗洛伊德往往会声东击西。这次他也来参加会议，我曾有幸同他见过几次面。”

“弗洛伊德？我一向认为他的想法太离奇了……几近于童话，”我争辩道，“最让我感到牵强附会的就是他所谓的无意识，他竟然认为我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未知的部分在决定着我们的行为。还有他那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认为儿童对双亲中的异性一方有欲求，儿童时期和性欲的关系很重要……恕我直言，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也读过几本弗洛伊德的书，福尔摩斯。作为一名医生，我想我应该读一下。可他那本解梦的书让我倍感荒谬……这本书读起来更像是小说而非科学著作。书写得很吸引人，思想层出不穷，可我认为没有说服力。尤为难以接受的说法就是梦是愿望的实现。我看，你和弗洛伊德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你们两人都依赖……”那个词我一时说不出口，看到我的老朋友求助于这种诱人的毒品，我总是不免心痛。

“可卡因。”福尔摩斯帮我把话说完，“你不必转弯抹角，华生。我承认，尽管我俩职业各异，却拥有这个共同点。我想，你对他的看法可能太苛刻了点。有不少人认为他为心理分析这门新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要弄清他是个骗子还是个天才恐怕为时过早。可我相信，后者是公允的评价。”

说完这话，福尔摩斯开始清理堆放在桌子上的试管、显微镜和其他器具。忙活了一阵之后，桌上便有地方搁书和写字板了。

“华生，”他断然道，“我不再做专家了，我要重新开始当学生，当然在我这个年岁蛮可以享受和品尝自己的研究成果了，也完全可以预期这些成果的重要性。华生，绝大多数学生是不能像我这么说的。他们太年轻、太幼稚了，根本不能重视自己拥有的机会。我要做一名学生去学社会理论，看看能否领会即将参加会议和出席韦布夫人晚会的那些精英的思想。韦布夫人出身富裕，却是工人阶级的捍卫者。有人会感到奇怪，可我不以为然。生活往往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要复杂得多，其中的弯弯绕难以预料。”

“我要走了，”我说，“明天6点再来。”

“好吧，华生。”福尔摩斯应道。

福尔摩斯说他认识弗洛伊德，而且见过不少次面，我对此禁不住感到好奇。难道弗洛伊德给福尔摩斯看过病？难道像福尔摩斯这样一个看上去特立独行、意志坚

强、才华出众的人也需要弗洛伊德所谓的谈话疗法？这让我感到很古怪……那么，我能想到的就是福尔摩斯的率性而为和超群的智力对弗洛伊德所谓的他的“精神”构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可能也是福尔摩斯为弗洛伊德辩护的原因。似乎很难让人相信，然而怀疑福尔摩斯曾做过弗洛伊德的病人也不无道理。真是耐人寻味。如今，福尔摩斯又要学习社会学这样一门新科学了。真是太离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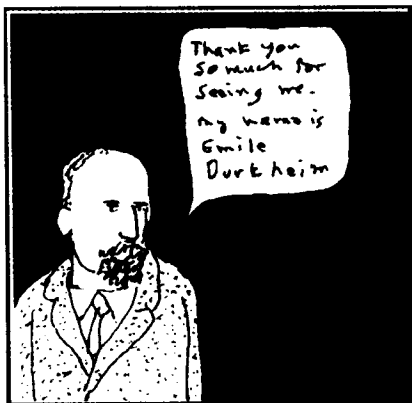
人类不可能摆脱一切束缚而行事。世上无一物能够享有如此的特权。世上的每一部分存在都与其他存在息息相关；其性质和表现形式亦相应地取决于自身和其他存在，后者因此对它构成束缚和制约。无机界和思想者之间只有程度和形式上的不同而已。人类的特权在于，他所受的束缚是无形的、道德上的，即社会性的。控制他的不是无情地强加于他的物质环境，而是胜过他自身良心且他感知到其优势的某种良心。由于他生命的绝大部分超越了肉体，他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却又受制于社会。

然而，当社会因某种令人痛苦的危机或有益却突然的转变而动荡不宁时，它就暂时不能施加这种影响，因此引起了自杀人数曲线的陡然上升。

——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

第三章

我正要离开福尔摩斯的公寓



我正要离开福尔摩斯的公寓，听见有人不断地敲打走廊的门。

“我想是韦伯夫人又有什么事回来了，”我说道，“也许她改主意了？”

“不对，华生，”福尔摩斯说，“那不是韦伯夫人。她敲门的声音很小——是女人的敲法。这个敲门声要大得多，而且连续不断——这是男人的敲法，可以肯定，这个男人或许正为什么事犯愁呢。”

福尔摩斯开了门，一个男人正站在过厅里，他上髭浓密、下须修剪整齐，着装做工考究，尽管不是英国的款式，却处处都显示出这是一位重要人物，是个自视甚高的人。

“请原谅我没提前通知就来拜访您，”他说，带点法国口音，“我是为一件急事而来。”

“进来吧，”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敬爱的同事约翰·华生博士。”他指着我说。

他走进房间，摘下帽子，在福尔摩斯的招呼下坐下来。

“多谢您的接见。我名叫埃米尔·涂尔干。我来伦敦参加一个即将召开的有关社会进步的会议。或许您在报上看到过？”

“的确看到过，”福尔摩斯说，“要是您注意一下我桌上的一摞摞报纸，就会知道我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会议报道差点把犯罪新闻都挤没了。伦敦报界吸引了一大批顶尖级教授和作家面面俱到地为此撰文。”

“对，对，”涂尔干说，“我来此是因为今天同一位主要发言人的—次交谈，这次谈话让我甚感忧虑。我的妻子因病未能同行。下午，我觉得该活动—下，于是决定出去散会儿步、呼吸点新鲜空气。在克拉里奇饭店的休息厅里，我碰巧遇到了马克斯·韦伯。”

“请说下去。”福尔摩斯懒洋洋地靠进扶手椅里。

“既然你一直在读报，那就知道马克斯·韦伯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德国社会理论家，为社会学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我拜读了一些他的作品，”福尔摩斯说，“觉得饶有趣味、引人深思。您的著作也是如此……我有幸读了几部。”

“太好了，”涂尔干说，福尔摩斯的话似乎让他吃惊，“这会有用的。我为他担心……非常担心。您可能不知道他有心理问题，他那种反复无常的状态已经有不少年头了。他极度抑郁，无法讲学，尽管这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或者说我是这么想的。我同他闲聊的时候，他不知何故显得异常沮丧，给我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他正在寻思着自杀。”

“自杀?!”福尔摩斯说，声调有些惊讶。

“对，”涂尔干答道，“他对我说他感到孤独、不为人所爱，尽管他有一位和蔼可亲、体贴入微的妻子，他的信念和复杂的心理问题使他和大学的同事日益疏远，这让他心烦意乱。再加上这些年很少教学，周围也不再会有学生和追随者，也没能在社会理论方面创建一个可以被称作‘学派’的东西。他因此深感孤立无援。谈话过后，我就去找他的妻子玛丽安娜，但她不在。于是，我决定前来向您求助，您是一位声望极高的侦探，而办理此事者必须机敏过人。”

“谢谢您的美言。”福尔摩斯说道。

“他需要受到保护以免自我伤害，”涂尔干说，“从他的现状来看，我担心他也会严重地殃及他人。”

“你认为他会因抑郁而想到自杀？”我问道。

“自杀，”涂尔干答道，“大众对此并非很了解。有一种自杀可作为我所谓的失范行为的例证，失范行为是指个人或群体不遵循社会准则或因准则变化不定或混乱不明而不能遵循时所付诸的行为。这些个人独立于社会，从而易于采取自杀行为或转而肆意犯罪。从字面上来讲，‘失范’这一术语是指无规范或无序，与聚合和社会关系的缺失有关。至于自杀，我已指出个人的自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现象。”

“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我惊讶地重复道，“即使自杀者是个人？”

“对，华生博士，”他应道，“您看，我的研究表明，一旦社会具有强大的整合力，且社会成员之间交往密切，个体差异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在价值和信仰方面达成普遍的共识，我把这种社会所具有的特点称作‘机械聚合’，在这样的社会自杀率较低。在另一种社会里，个体差异被扩大到最大限度，几乎没有共识，其特点被我称作‘有机聚合’，在这样的社会自杀率较高。

“我认为，实际上有四种类型的自杀。我把其中之一称作‘利己主义型’，它出现在维系人们的纽带过于松弛而且人们丧失了对他人的责任感之时。我想，这正是韦伯的苦楚。还有一类‘失范型自杀’，发生在社会规范失效或不明朗之时。而当个人的责任沉重、社会要求繁多或当人们拥有强大的集体纽带并且对他人具有责任感之

时,就会见到我所谓的‘利他主义型自杀’,该类型时常出现在人们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或某种社会要求加诸其身的情况下。最后,还有一种‘宿命论型自杀’,在此驱使人们自杀的是绝望感。

“尽管自杀者都是个人,个人自杀的可能性却都离不开社会因素比如说个人的社会背景。您瞧,我在尽量减少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因素对理解人类行为所起的作用。我们是否能够认识人们行为的终极原因,这我不得而知,但我们能够找到行为与社会现象之间的重要关联。

“我的兴趣在于我所谓的‘社会事实’,可以把它看作种种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并且能够对个人施加外在的束缚。社会事实是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且独立于个人意识的事物。从本质上讲,社会是通过个人意识与我们可能称作集体意识的某种东西的结合而形成的。

“这就是说,社会是我们难以企及或在我们之外的某种东西,同时又是我们自身内部的某种东西。我们是个人但又是社会人。因此,可以通过个人所处社会的性质和个人的社会背景来认识自杀,自杀者的意识不占主要地位。

“如果不再把个人自杀行为看作个别事件,认为它们互不相关、需要分别对待,而是把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自杀事件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该整体看起来就不单单是独立单元的总和或集合,而是成为别具一格的新事实,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个性,最终具有自己的特质且主要是社

会性的特质。”

“我必须承认，涂尔干教授，”我说，“我很难以这种方式来想问题。或许因为我是个医生，习惯于分别治疗，病人带来的医疗问题各不相同。”

“您说的可能没错，华生博士，”涂尔干道，“个人有个人的医疗问题，但再想想偶尔也会突然爆发瘟疫或天花这样的疾病，成百上千万的人会因此丧命，有时候成批的人会染上爆发的某种疾病。因此，有些疾病是通过传染的方式扩散开的……还有一些疾病是社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营养不良。

“在我看来，社会或更确切地说是产生于特定社会的‘集体意识’始终体现在个人身上。我的研究表明，正是宗教在个人形成信仰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而信仰又促使人们遵从社会的要求。我建议把世界分成两个领域，宗教界和世俗界。宗教界是宗教的世界，世俗界是日常世界即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领域，宗教关怀似乎在此不起什么作用。正如我所界定的，宗教是与神圣事物相关的信仰和习俗的体系，神圣事物是被分离出来的有禁忌的事物，把信仰和习俗统一于一种道德的社团叫做教会，教会中所有的人都遵守这些信仰和习俗。只要有宗教，肯定就有某种形式的教会。

“我发现，在天主教国家，宗教信仰把人们聚合在一起，自杀率往往偏低，而在新教国家，人们多多少少都在各行其是，宗教成为一件更具个人特性的事情。我最终

认为,宗教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还应该被看作社会的一种先验或观念上的表现。宗教界为宗教所独有,而且只要有宗教就会有教会。世俗界则是社会领域,即工作、休闲与日常活动的领域。然而,宗教领域会对世俗领域产生影响,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当然,大多数人尚未认识到这种情况。

“我指出,这是因为思想的基本范畴都与宗教有渊源,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大型社会公共机构都诞生于宗教。要是说宗教孕育了所有社会基本成分,那是由于宗教观念就是宗教的灵魂。因此,宗教力量便是人类的力量、道德的力量。”

“那么,涂尔干教授,自由置身何处呢?”我问道,“这似乎是您的理论的逻辑意义。要是在赋予人以道德感和遵从社会约束的欲望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宗教,那您如何解释自由呢?”

“不,华生博士,”涂尔干答道,“并非如此。人是自由的,可不是绝对自由的,也不可能绝对自由。人们必须遵守社会规则,否则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人们最终会比遵守社会规则时更不自由。”

他讲起了课,好像面对着自己的学生。“人的特权在于他所受的束缚是无形的、道德上的,即社会性的。控制他的不是无情地强加于他的物质环境,而是胜过他自身良心且他感知到其优势的某种良心。由于他生命的绝大部分超越了肉体,他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却又受制于

社会。”

“我把前面所说的那些不接受社会规范者叫做失范者或无规范者。然而，并非所有的失范者都会自杀，有些人会成为罪犯。我们无法摆脱所有的束缚。人的独特性在于所受的束缚是无形的道德上的，即社会性的。一旦发生灾难或社会大混乱，平时维系人们的约束力就会不足，于是出现了失范以及与之相伴的自杀和越轨等现象。

“而犯罪具有一种有趣的遮蔽功能，它会召集和聚合起正义的良心。我指的是犯罪做了社会弊病的替罪羊。有了千夫所指的越轨者，整个社会群体就能够获得团结感，而且能够加强道德与社会认同。重大犯罪可以提高人们对侵犯道德行为的认识，从而与所处的社会取得一致性和认同感。我对于犯罪行为及其对相关人士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兴趣。目前，我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因此，我认为就维护群体道德与群体一致性而言，越轨具有一定的功能，因为越轨者让我们意识到彼此的不同。这也意味着我们把罪犯投入大牢的真正原因并非是要改造他们，而是要借此重申我们道德上的优势和社会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福尔摩斯道，“但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时常遇到这样一些罪犯，他们似乎并非意在获取成功，而是别有所图。有些杀人犯受嫉妒或疯狂的仇恨驱使，而不是想获得经济利益。”

“很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教授表示赞同，“请

记住,我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和各种群体而非个人。我们社会学家关注的是整个社会以及作为群体和组织成员的个人的所作所为。您所说的多半都是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我相信,从机械聚合向有机聚合转化过程中牵涉的劳动分工在此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社会以机械聚合为特征时,很少有失范状况。一旦社会以由非人格化的大公司的增加所代表的有机聚合为特征时,曾经维系人们的纽带就会断裂,同时出现较普遍的失范状态。而能够统一人们信仰和道德的我所谓的集体意识要么会四分五裂,要么会无限地弱化。”

“这么说,涂尔干教授,”福尔摩斯边靠进椅子里边说,“您的理论认为,罪犯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相当有用。那么依照您的理论,我这样一个终生与罪犯周旋的人实际上是在危害社会。当然,我有意夸大了您的论点的荒谬性,但我不由得想说:这真是妙不可言。您从该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我是一个机能不良者。真是太滑稽了!”他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涂尔干微微一笑,更多的是出于礼貌而不是感到滑稽。

“不尽然,通过抓获罪犯,您让社会找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不法分子,相形之下人人都可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而您无形中则促进了社会的团结。要是我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迪而不仅仅是娱乐消遣的话,”涂尔干道,“我常常想,这就是教授们应该做的。”

“现在回到您此行的主题上来，”福尔摩斯边说边站起身，“我会尽我所能阻止韦伯教授伤害自己或他人。我向您保证，涂尔干教授。”

“不知该怎样感谢您，”他说，“为此您想要什么样的报酬我都愿意付出。”

“谢谢您的美意，教授，”福尔摩斯说，“可我和我的搭档华生不索取任何报酬。”

“我还想请您帮个忙。这儿，”涂尔干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有一个封好的信封，里面有一封我写给您的信。在我没发出请求之前，请您不要拆读这封信。我想您会觉得此信妙趣横生。我可以托付给您吗？”

“当然可以，”福尔摩斯边答应边接过信封，在手上摆弄着，“在您告知我们之前，我和华生都不会去看信的内容。我向您保证。”

“好。”涂尔干教授说道。

谈妥后，涂尔干走了。

“涂尔干认为犯罪源于社会因素，”我对福尔摩斯说，“但我不禁想到其中是否还有身体因素。”

“比如说？”福尔摩斯问道。

“我常想，大脑的额前皮层可能与犯罪行为有关。它控制着可能称作我们较高的智力功能的部分——我指的是推理、判断和冲动控制。额前皮层的某些部分与愤怒有关，而额前皮层在我们的头脑中所提供的产生抑制或抑制因素的能力很可能出问题，以上因素都隐藏在罪犯

的冲动行为背后。”

“这个假说太有趣了，华生。”福尔摩斯说，“我想到这会有助于我们了解犯罪行为。看起来，社会学家未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件事就是人的头脑，亲爱的弗洛伊德医生对此有不少话要说。他们也忽视了行为的生物成分。由于社会学家将人视为社会性动物，往往把犯罪从根本上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涂尔干解释说犯罪与越轨有关，而韦伯很可能把犯罪行为看作禁欲主义的新教思想向物质财富的转移。杜波依斯会联系到种族问题，而韦布无疑会联系到贫穷。

“然而，为何有些人成了罪犯而另一些则不会，这的确是一个谜。华生，我们抓获的罪犯拥有不同的阶级背景和职业。为何人会变成罪犯，我把该问题留给社会学家和其他人去解决。我们的任务是查出罪犯并将他们绳之以法。这是迈向社会进步的重要的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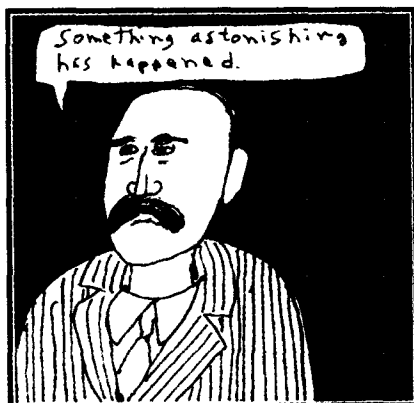
在它发展到最高水平之地的美国，对财富的追求由于脱离了宗教与伦理的涵义，往往会与纯粹的世俗情欲相关联，而后者常常赋予它以竞技的性质。

无人知晓将来谁会入住这个牢笼，无人知晓在快速发展的尽头是否会出现全新的先知，也无人知晓旧日的观念和理想是否会粉墨登场抑或是出现以妄自尊大为矫饰的机械的僵化。对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毋宁说：“专家没有精神，肉欲主义者没有心灵；如此的虚妄想象着它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四章

翌日凌晨，我正打算……



第二天一早，我正打算从从容容地与妻子共进早餐，女仆拿进来一封福尔摩斯的电报。我放下叉子，打开电报。

“速来，”福尔摩斯写道，“社会理论家们情况紧急。”

“天哪，”我寻思道，“昨晚肯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我喝茶时差点被烫着，狼吞虎咽地吞下草莓酱吐司，向妻子道别后，我匆匆赶往福尔摩斯的住所。当我来到

贝克大街 221 号乙时，看到苏格兰场的莱斯特雷德警官正在屋里踱来踱去。福尔摩斯坐在那里，双目紧闭，左手搭在前额上，陷入沉思。我看到一本本从书架上取下来的社会学书籍摊开放在书桌上，上面画着道道儿，页边写满了批注。有些书还堆在书商的包装纸旁边，好像是福尔摩斯昨夜刚买来的。其中有一本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本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社会学》以及另一部著作《货币哲学》也在里面。W. E. B. 杜波依斯的《黑人的灵魂》和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放在一起，还有一本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其他许多书我都能看到书名，其中不少书夹满了纸条，书籍旁边还放着写有大段批注的便笺。

“莱斯特雷德，”我握着他的手吃惊地说，“您为何而来？有哪位来伦敦开会的社会学家出事了？”我不想显露出对韦伯教授之事已有所知。

“对，”莱斯特雷德解释说，“令人瞩目的事情发生了。昨晚，一群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在克拉里奇饭店的私人套房里共进晚餐。其中有来自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及其夫人玛丽安娜。我相信建议大家会餐的人是韦伯的妻子。还有一位德国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他的妻子因访友未能参加。我觉得韦伯和齐美尔是好朋友。法国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也在场，我想他只身来伦敦是由于他的妻子患病在身。此外还有

名叫杜波依斯的著名黑人社会学家和一位俄国革命家列宁。这两人都未携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是这样。我认为列宁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还邀请了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比阿特丽斯·韦布，她的丈夫悉尼未能出席，我想她因此请来了一位朋友、布拉克内尔基金会的主管塞西莉·布拉克内夫人。看起来奇怪的是，赴晚宴的许多人都已向该基金会提交了申请，当然都有正当理由。”

“席间的交谈肯定不同凡响，”我说，“那可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一些大脑在会餐呀。”

“一言难尽，”莱斯特雷德说，“就在晚餐结束大家起身准备离开之际，韦伯、涂尔干和其他几位社会理论家陷入了一场关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争论……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我的理解而言，涂尔干以比较过分的方式抨击了韦伯的理论。韦伯是个高大强壮的人，从心理角度来讲似乎有些反复无常，当时他难以自制，一拳打在了涂尔干的脸上，左脸。人人都试图劝阻韦伯，他那时好像在疯狂地胡言乱语。布拉克内尔夫人则因受到惊吓晕了过去。就在她即将倒地之际，一名侍者搀住了她。人们马上围过来帮她。真是一片混乱。她慢慢地恢复了知觉，韦伯、列宁和齐美尔把她扶到椅子上，涂尔干则跑进厨房拿来一条裹着冰的毛巾助她苏醒。”

“太可怕了。”我应道。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莱斯特雷德沮丧地说，“弗洛伊德是个大夫，他急忙过来给她做检查。他摸过她的脉，

又问了她几个问题。她似乎一切正常。没一会儿，布拉克内尔发出一声尖叫。‘我的钻石，’她高呼，‘我的钻石呢?!’她的脖子上一直佩戴着串在一条细金链子上的大钻石首饰。大家开始在地板上查找，最后找到了链子，但没发现钻石。布拉克内尔钻石是一颗绚丽多彩的宝石，价格不菲。布拉克内尔夫人很爱惜这颗钻石，几乎到了不戴不出门的地步。它具有情感价值，她说……因为这是她已故的丈夫欧内斯特所赠。布拉克内尔夫人为这颗钻石上了一大笔保险，但她还是更想把钻石找回来。我们这儿可是一群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看来其中有人未能抵挡得住诱惑，偷走了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

“天哪，”我大叫，“真是太可怕了!”

“奇怪的是，当时饭店的侦探就在附近，他同我们取得联系后，我们马上派了一些人过去。我们搜查了屋里所有的人，在谁身上也没找到钻石。你能想象得到，此事该有多棘手。我们派人看守着内室和厨房一带。如果此事在报上公开，就会成为一桩丑闻，这就是我此行的原因。我请福尔摩斯尽其所能找到钻石……看是否能阻断丑闻。钻石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我们三番五次地搜查了相关场所，可就是找不到。”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莱斯特雷德接着说，“涂尔干离开饭店时狼狈不堪。由于左脸肿胀，他捂了一大块冰消肿。今天早上，我们在泰晤士河边的下水道里发现了

他的钱包。他一直晕乎乎的，我们担心他遭劫后掉进或被推进了泰晤士河。我们的人正在河里搜寻。

“要是涂尔干还活着，若非受了伤，他肯定会返回宾馆房间。我猜想韦伯的那一拳极大地伤害了他并且引起了一连串的后果。我们查询了所有的医院，但昨晚没有一个形似涂尔干的人入院。我去找韦伯夫人谈话，她告诉我说她已经聘请了福尔摩斯，我便来此请他协同调查珠宝失窃案以及此事，看看他是否能提供有助益的信息和线索。赴宴者都不知道涂尔干死了，就连马克斯·韦伯也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尽管眼下看来他可能是致涂尔干于死地的人，虽然他自己并未意识到。但在我执行任务之前，我想确认涂尔干之死。晚宴上的人个个焦虑不安，为珠宝被盗和韦伯的行为而心烦意乱。我认为他的心理极不正常，很可能精神错乱或成为罪犯。这类事情注定会发生。我在纳闷这些社会学家是否都不大正常，也许他们应该到另一个机构去？”

“在我继续调查珠宝失窃案期间，我让所有赴宴者都呆在克拉里奇饭店。布拉克内尔夫人极其沮丧，但她还是同意眼下绝口不提此事。我们还让其他人都发誓保守秘密。赴宴者都认为我在调查昨晚的失窃案。我希望他们的想法没错。”

福尔摩斯陷入了沉思。莱斯特雷德告诉我昨晚事情经过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莱斯特雷德，”他开口道，同时抬起了双手托着的

头。“我会立即开始调查珠宝失窃案。我要搜查整个饭店并询问相关人员,以便得到更多的信息……这样我才能挖出事情的真相。”

“当然,”莱斯特雷德说,“您知道我是多么欣赏您的才能。您肯接手此案真是太好了,因为我正全力经办另一个案子,我暂时称之为‘单身贵族案’,您接管此案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您不必担心韦伯还会干什么,”福尔摩斯又道,“他很可能正为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他的妻子肯定被他的举动吓坏了。时间是关键。我们要防止因珠宝失窃案而引发丑闻。”

“我和华生马上去克拉里奇饭店询问赴宴的每一个人。此案可能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人与珠宝被盗有关。可能有一撮职业盗贼在此行窃。假设他们不能亲自藏匿钻石的话,那么我想知道钻石会藏在哪儿。然后我才能确定是谁拿走的。”

莱斯特雷德看上去松了口气。“我们彻底搜查了那地方,搜查了包括厨师、侍者在内的餐厅附近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要是有人能找到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我敢肯定那就是您,福尔摩斯。”

我深信福尔摩斯能够找到钻石,并且会在失窃案一事走漏出去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之前把窃贼送进大牢。我想,有可能而又最不可能之事是某个著名的社会学家

窃取了珠宝。要是这样的话，那将会是一桩可怕的丑闻。在英格兰，没有哪一个侦探能与福尔摩斯匹敌，所有在他人看来无法侦破的案件在他面前都会迎刃而解。

“祝你们的询问工作顺利。”莱斯特雷德临别时说道。

“谢谢，莱斯特雷德，”福尔摩斯说，“和教授们打交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要么金口难开，唯恐说错话被人逮住；要么正好相反——滔滔不绝地谈他们自己、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成就。他们满脑子奇思异想，而且常常做一些荒谬的实验。我发现，他们大多数都让人难以忍受。”

“福尔摩斯，”我说，“你才当了一天学生就对教授们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反感。”

“说得对，亲爱的华生。恐怕没人会喜欢教授们，除了他们自己……可能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我们现在就去克拉里奇饭店，看看我们能从昨晚宴会上相聚的世界名人那里学到点什么。”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莱斯特雷德所说之事似乎并未让他十分担心。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他惊人地自信……还是对我一无所知之事他早有所知。

在既定的货币经济中，金钱欲是思想所展现的永久倾向。因此，心理学家不能忽视人们时常抱怨说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当然，他可以在此驻足，发现两者间的重要关系，因为不去亵渎神灵是心理学的特权。上帝这个概念的深刻本质在于世界上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一切都可以从中求得统一，用库萨的尼古拉所创的美丽词藻来说就是“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指的是呈衰微之势的中世纪所特有的现代精神。正是这一思想使得存在中那些奇特而难以协调的方方面面求得统一与和谐，和平、安全以及富裕之感皆源于此，而这些都是上帝观念以及我们拥有上帝这一观念的组成部分。

金钱所激发的感情在自身的领域内与此相似。通过逐步成为绝对充分的表达方式并且等同于一切价值，金钱以相当抽象的方式得以提升，从而俯视着万事万物；它已然变成了中心，极其对立疏离、格格不入的事物都能在此找到共同之处，相互接触。

——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文化中的货币》

第五章

我和福尔摩斯一大早就赶到了克拉里奇饭店



我和福尔摩斯一大早就赶到了克拉里奇饭店，让经理安排一个房间，以便我们分别询问卷入那场乱纷纷的晚宴的人。与此同时，我们走进餐厅，重演了昨晚的每一幕。壁炉架上有个淡淡的污迹，这对我这个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来说格外熟悉，更别提我还曾在阿富汗战争中当过军医。

“血！”我向福尔摩斯喊道。

他检查了血迹。“华生，你看到血溅出的长椭圆形了

吗？涂尔干当时肯定站在这个方向一英尺开外，韦伯则从这个角度向他打去。谢谢你敏锐的洞察力，这对我很有帮助。”

检查完血迹后，福尔摩斯继续按原计划行动。他把一颗弹珠扔到布拉克内尔夫人晕倒的地毯上，让它在屋里滚动。弹珠的大小与钻石并不完全一致，但福尔摩斯似乎对它能在屋里模拟钻石的路线甚为满意。他好几分钟都趴在地上跟踪弹珠滚到角角落落。我要是不甚了解福尔摩斯的话，看到一个成年人那样的姿势会觉得十分尴尬。

我们很快在厨房和各储藏室巡视了一圈。在冰屋里，福尔摩斯指着一块被削去一角的冰。

“削得很不专业，”福尔摩斯说，“也许有个侍者是新手，也许有个外人在此。”他从衣袋里拎出表来。“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这块冰。可是，现在我们应该回去问问那些著名的思想家了。”

我们安排会见的第一位是布拉克内尔夫人。一名警察敲门让她进来。这位可怜的女士状态很糟糕，两眼通红，好像哭了一整夜。她慢步走进屋内，坐到福尔摩斯指给她的位子上。她约摸 70 岁，身材修长，眉清目秀，穿一身做工精美的灰色套装。

“您可能体会不到您来办理此案叫我有何高兴，福尔摩斯先生，”她说，“要是有什么人能办妥这个可怕的案子的话，我敢肯定那就是您。当然，还有您的搭档华生博士

的帮助。”她向我点了点头。

“别担心，布拉克内尔夫人……我会查清此事，把钻石物归原主。如果钻石藏在屋内的某个地方，我会找到它的。如果不在这里，我也会找到，不论它在哪儿！”

“呵，谢谢您，福尔摩斯先生，”这位女士说，“那颗钻石是我的骄傲和欢乐。它是我已故夫君欧内斯特所赠，我随时佩戴着以寄托思念之情，尽管有人告诫过我，因为它太贵重了。我俩相守了45年，直到他去世。虽说已上了两万镑的保险，可我还是想要找回我的钻石……您可能会理解。”

“这我理解，”福尔摩斯说，“请告诉我您被邀参加昨晚宴会的情况。”

“我是比阿特丽斯·韦布的好友。她的一些计划得到过我主持的基金会的资助。事实上，宴会上有不少学者也都提交了资助申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除了弗洛伊德大夫和列宁先生，其他人都申请了。因此，我想找个机会与他们见见面，好对他们的才干有点印象，从而对是否资助他们的计划做出审慎的决定。”

“当时，我们在一张圆桌周围入席，桌子中央有一尊美丽的天鹅冰雕。韦伯教授坐在我的左边，涂尔干教授坐在我的右边。齐美尔教授紧挨着韦伯教授，他的另一侧就是我亲爱的朋友比阿特丽斯。再过去就是列宁先生、弗洛伊德大夫和杜波依斯博士。这次晚宴让我有机会同每个人都聊一聊。当然了，食物甚佳，服务上乘。”

“好几位都提交了资助申请。这让我感到不同寻常。”我说道。

“不尽然，华生博士。我的基金会接受各色人等为他们的有价值的计划提交的种种申请。教授们都有很好的研究思路。当然，问题在于我的基金会财力有限，我无法资助每一项好计划。”

“能否告诉我每位教授想拿您的基金会提供的资金派何用处。这与眼下之事有些关系。”

“当然可以，”布拉克内尔夫人道，“我老了，身体也有些虚弱，但头脑仍很清醒。法国教授涂尔干先生打算创办一家新的学术出版社，出版与自杀、犯罪行为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研究相关的书籍。此事相当重要，但我想资助学术出版社恐怕有些偏离我们的旨趣。齐美尔教授准备兴办一家研究所，对他所谓的‘日常生活’展开调查研究。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对于制度和群体都持有高深的理论，但没人肯花时间去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从事的日常事务，如人们吃什么、说什么、在工作中干什么、如何自娱自乐等这类事情。我要说，他的申请很有意思，可我不理解它将如何缓解社会问题，而这才是我的基金会关注的焦点。杜波依斯博士申请资助他建立一个可授予奖学金的研究所，以便他族类中的贫困者能够接受大学教育，这类计划早已成为我们的资助对象。韦伯教授想利用资金开展研究，写一部论宗教与经济体系之间关系的著作。这也有悖于我们的宗旨，尽管从长远来看意义

重大。我在管理基金会期间所面临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太多，要求我们资助的有价值的申请也太多。可我只能量力而为。”

“所以说，”福尔摩斯的脸上现出一副满意的神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有许多教授需要资金。眼下的问题是他们中间或餐厅里的某个人是否乘虚而入窃走了您的钻石并把它藏在某处，想借此获取资金。”

“我不敢相信宴会上哪一位会干出此事，福尔摩斯先生，”布拉克内尔夫人道，“他们都是知名人士，享有盛名之人。我很难想像他们会干出这种事情。”

“您要是知道一个人在自以为不会被人抓住的情况下会干些什么，您会感到惊讶的，布拉克内尔夫人，”我插话道，“有时，当一个人处于有望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境况时，他会暂时丧失理智。有些哲学家指出，大多数人都有道德，这是因为他们从未受到过诱惑，从来也没有机会不道德。我总觉得，该观点不无道理，尽管我们的社会学家朋友们很可能认为不道德的人尚未很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或者还生活在不辨是非的混沌阶段。”

“但愿您说得不对，华生博士，”她答道，“话又说回来，您和福尔摩斯先生对罪犯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而我却没有，幸好……或者说至少昨晚以前是这样。”

“您是一个勇敢而善良的女人，”福尔摩斯说，“您在贵基金会所做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所见到的教授和学者们都是来此谈论社会进步的，可我认为您

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正在促进社会进步。尽管放心好了，您不久就会重新得到您的钻石……同时，您也会对男女众生的道德持有更加舒心和乐观的态度。您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对此非常感激。”

“谢谢您，福尔摩斯先生。我深信您会找到我的钻石并且证明我对人类信念的正确性。”

言毕，布拉克内尔夫人起身告退。

“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福尔摩斯在她走后评价说，“也许随时佩戴那颗钻石是有些鲁莽，可我认为她不仅异常敏锐聪慧，而且有点多愁善感。很多时候，正是我们的情感使我们陷入困境，华生。社会思想家所构想的处理我们情感问题的办法应该妙趣横生。”

现代官员特殊的运作方式表现如下：

存在着固定的、通过规则即法律或行政规则普遍有序安排的、机关权限的原则，也就是说：

1. 对为了官僚体制统治机构的目的所需要的常规工作进行固定的分工，作为职务的义务。

2. 对为了履行这些义务所需要的命令权同样进行固定的分割，并且通过规则对赋予它们的（有形的、宗教的或其他的）强制手段做出严格的界定。

3. 为经常和持续地履行这些义务和行使相应的权利，通过招聘具有普遍规定资格的人员，有计划地事先做好安排。

这三个因素在公法的统治里构成一种官僚体制的“行政机关”。在私有经济的统治里，则构成一种官僚体制的“企业”。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制度在政治的和教会的共同体里，到了现代国家，才得以充分发展。在私人经济里，则到了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制度里，才得以充分发展。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

第六章

马克斯·韦伯敲了敲我们的房门



马克斯·韦伯敲了敲我们的房门，然后徐徐打开。他的步态异常缓慢，身体略微有些佝偻。他是个大块头，看上去很强壮，髭须浓密。我估摸他大约 50 岁。他脸色苍白，慢慢地坐在一把椅子上。由于某种原因，他似乎全然丧失了活力。我冒出个念头，想赶紧把他送往附近的圣约翰医院，给他彻底检查一下。要是韦伯的妻子说的没错，他的问题是心理上而非身体上的。

福尔摩斯主动发话。

“我叫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介绍说，“我是一个私家侦探，这位是我的搭档华生博士，”福尔摩斯指指我，“我正在调查昨晚发生在您妻子安排的晚宴上的事件，韦伯教授。”

“那场可怕的晚宴，”他有气无力地说，“不仅发生了令人大惑不解的珠宝失窃事件，我还受到埃米尔·涂尔干的严重侮辱。我一向认为他是我的朋友，即便我俩在涉及社会学理论的某些本质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我强调个体行为者，而他关注的是社会力量。我们对自己的理论展开讨论，不久就变得异常激烈并导致涂尔干出言不逊。”

“我想不出他有何理由对我如此愤怒。昨晚有一刹那我明确感到他想打我，于是我就照着他的脸打了一拳。这纯属自卫——一种本能的反应。我在海德堡读大学期间曾经是决斗会的成员，我在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之前就已经采取行动了。幸亏这一拳并不重。我想昨晚发生的事件，就是珠宝失窃案和我的行为，并不表明社会进步前程似锦吧。”

他勉为其难地笑了笑，以示对自己笑话的回应。

“您能想得出是谁拿走了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吗？”我问道，“据我所知，她晕倒的时候，你们在她近前的好几位都争着去帮她。会是你们中的哪一位趁机拿走的吗？”

“不像话，”韦伯说，“太不像话了！当时室内有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都是拥有国际声誉和很高境界的

人物。我没有拿,我也难以相信我们之中有谁会拿。再说,要是晚宴上有人拿了,那么把它藏在何处呢?警察不辞劳苦地把那里搜了个遍。”

“那您认为是谁拿的呢?”福尔摩斯问道。

“应该是一个员工,至于如何下的手、有何用途……藏在何处,我一无所知,”韦伯答道,“可能是侍者或其他员工。”

“这是最明显的可能性,”福尔摩斯表示赞同,“布拉克内尔夫人告诉我们,您在向她申请资助。我突然想到您有可能缺乏资金,想得到一些钱来维持一阵子。是这样吗?”

“不是,”韦伯应道,“我已经有限度地重新开始教学活动了,尽管我的经济状况有些吃紧,可我并不需要钱。我得承认,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可以极大地弥补校方给我提供的研究经费的不足。我们这些教授向来都是从基金会寻求资金帮助我们开展研究的。”

“这我理解,”福尔摩斯说,“我最近了解了不少教授的情况……以及他们的种种需求。让我们再回到您和涂尔干教授的争论上来。你们到底在争什么?”

“教授们常常相互争论,”他答道,“您应该理解。我们一生都在试图证明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而那些与我们不一致的理论是错误的。针对社会学思想中何者最为重要的问题,我和涂尔干陷入了争论。在我看来,阐释社会学把个体及其行为视为基本单位,视为基本要素——

原子,要是愿意这么说的话。涂尔干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认为,个体是有意义的行动的唯一承担者。国家、联盟、封建制度等这类概念都指的是人们相互作用的某些范畴。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抽象的概念简化为可理解的行动,也就是无一例外地简化为个体参与者的行动。我所定义的社会就是一群个体的人,了解社会的手段就是调查研究个体间的相互作用。”

“那么,您如何区分社会和社会学?”我问道,“在我看来,由于您对个体的关注,社会似乎不过是个抽象概念。”

“问得好,”韦伯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我刚才谈到什么是社会……我认为,它是一群个体的名称。社会学在我看来,我的定义确实有些太专业了,是一门对社会行动进行阐释以便对其起因、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的科学。该行动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完全内在的或主观的。它可能是对某一状态积极的干涉或者有意避免这样的干涉或者消极地默认这一状态。也就是说,在某些人们可能行动的情况下,不行动就是一种行动。”

“由于行动个体或许多个体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只要该行动虑及他人的行动从而关涉其进程,行动便具有社会性。行动对于人的意义才是重要的,而个体间共有的价值和利益才具有关键性。比如,我们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自足体,而是个体间行动和反应的方式,它与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息息相关。国家是在规定的领域内成功垄断合法实力的人类共同体。”

“您能听明白吗？”他问道。

“还行。”我答道。说实话，我不大明白教授的思路，我在领会论说方面有困难。

“所以，我可以把您打向涂尔干教授的一拳看作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福尔摩斯说道。

韦伯的脸刷地变白了。他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来整理思路。

“我为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他说，“让我们回头看造成此事的原因。涂尔干所持的社会学观念正好与我相反。他认为，在个体意识之外和之上存在着某种不明确的集体意识，这种恒定的意识形成思想并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传送给每一个人，这在我看来是过于简单化的想法。他认为，这些思想提供了塑造思想和行为的模式。这我难以苟同。他实际上认为社会塑造了个人行为。他在著述中提出集体表现这个概念，并借此指出人们共同持有的观念和某种集体意识即多个个体意识的结合导致了社会的存在。他想创办一家出版社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似乎急于促成此事。

“此外，”韦伯接着说，“涂尔干对我们社会学家所说的‘功能主义’深信不疑。他认为，我们想要解释一个社会现象，就必须研究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或行为以及它所起的作用。他用‘功能’这个术语来替代‘目标’或‘目的’，因为在他看来，研究社会现象要根据它们在维护社会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或者根据引起社会混乱的功能

不良行为。他认为,我们必须确定被研究的事实与社会总需求之间是否存在功能关系。”

“我看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完全不足以用来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涂尔干所属的有机学派试图通过把个体活动于其中的‘整体’作为起点来理解社会的相互作用。这样一来,对个体行动和行为的阐释多少类似于生物学家看待身体器官在机体‘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从幸存的机体的视角来看。

“这种功能参照系为实用性解说大开方便之门……但据我所知,这仅仅是社会学分析的开端……并非目的。要正确阐释一个行动的原因,既要研究行动本身,也要研究与行动相关的个体动机。要知道,涂尔干的思想多半已被社会学家所摒弃,”韦伯又道,“他的思想已是明日黄花。实际上,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比喻说,涂尔干死了!”

“涂尔干死了?”福尔摩斯问道,声调中透着惊愕。他显然对此话惊讶不已,“这是不是有点残酷?”

“或许,他的思想在法国很流行……但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没几个学者把它当回事。涂尔干是个过头的决定论者。他给人类的智识或道德鉴别力没留什么余地。”韦伯说道。

“您今天或许见过他?昨晚你们争执过后,他跌跌撞撞地出了饭店,至今没人见过他,”福尔摩斯说,“您能想得出他可能在哪儿吗?”

“我没见过他，”韦伯说，“我不是他的监护人……我也没主动负责找他。我为打他的那一拳羞愧难当。我相信您能理解。尽管我没躲着他，我也没去找他。他可能要避开大家……他为昨晚之事心烦意乱……或感觉不好。”

我必须承认韦伯所谓“涂尔干死了”的话让我感到震惊，原因显而易见。我觉得要理解韦伯教授所说的话非常困难。如果他是一名伟大的社会学理论家的话，我确信这门新科学没有多大意义。昨夜福尔摩斯一直在读韦伯、涂尔干和其他许多社会学家的著作，他似乎能明白韦伯在说些什么并且能兴致勃勃地关注他的论点。

“我应该告诉您，”福尔摩斯说，“作为一名侦探，我也极为关心动机及其与人们行动之间的关系，就拿谋杀来说。”

福尔摩斯边说边审视韦伯的表情，可我没看出他有什么反应。或许套用韦伯的想法来说，没反应就是一种反应？

“在谋杀案中，我们时常能发现不少嫌疑犯的动机，”福尔摩斯说，“但往往是那些动机隐秘者才是真凶。要找到隐秘的动机真是个问题。当然，其他类型的犯罪，比方说珠宝盗窃同样如此。”

“对，”韦伯说，“我能理解。尽管人类行为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但还有其他事情需要考虑。几年前，我在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过此事。您也许

知道这本书吧？”

“没错，”福尔摩斯说，“昨晚我还在兴趣盎然地读这本书呢。”

听到此言，韦伯似乎轻松了一点。他甚至淡然一笑。

“真想不到。”他说，“您知道，我在书中指出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思想和资本主义之间有很大关系，我把它称作‘世俗禁欲主义’并认为它引起原本与宗教界相关的宗教观念向世俗界的转移。加尔文认为，神职人员要是富有的话，他们的威信就会提高。休闲娱乐可以免去，时间则不可浪费。长期艰苦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节俭的生活和朴素的衣着受到鼓励。财富是上帝预定给成功人士的标志，他就是上帝的选民。

“在加尔文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追求生活一致性的强大趋势，这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这一切的思想基础在于对肉体崇拜的否定。清教在心理上的效应是把获取财产从中世纪生活的传统伦理中解放了出来，通过使获取本能合法化并在某种意义上视其为上帝本身的意志来打破束缚。于是，财富变成了上帝赐福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对世俗使命中永不止息、有条不紊的工作的评估成为通向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与此同时成为复活和真正信念最可靠、最明显的证据……这导致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要记住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古代世界或非西方的宗教中都没看到这种‘世俗禁欲主义’。”

“韦伯教授，”我插话说，“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他说道。

“您是说，”我问道，“在某种程度上，清教是我们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根源，人们在宗教信仰的激发下努力工作、积累财富，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

“的确如此，”他说，“我的理论是新教把人们从中世纪贫穷神圣论中解放了出来，认为追求财富光荣，而积累财富是上帝赐福的标志。华生博士，请记住个人行为的基础是信仰。我访问美国期间，发现源于禁欲主义新教的资本主义的宗教和伦理基础已被剥除，而对财富的追求如今呈现出一种运动的特征。起先，人们以为对外在商品的追求如同一件轻巧的披风一样落在那些追求物质商品之人的肩上，但是披风却变成了铁笼，物质商品不断增长的权力最终不可阻挡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也许敢说，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宗教禁欲主义的牢笼，不再需要它了。没人知道将来谁将入住这个牢笼。”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教禁欲主义反过来又受到它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当然，人们不能赋予宗教思想以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和民族性那样的意义。我认为，思想不单单是对物质利益的直接反映……有种东西我称之为‘有选择的亲和力’，指的是某些社会集团和思想以某种方式相互搜寻。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这种人所持的经济决定论，而我认为恰恰是信仰和价值观而非经济关系造就了社会。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

济关系正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实际上您难道不是承认了涂尔干所说的某种集体意识和社会因素影响了个人行为吗？”我质疑道，“您所说的禁欲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我看来与此相近。”

“绝对不是，”韦伯答道，“您要知道，我把加尔文的思想 and 禁欲主义新教用作我所谓的‘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我用于理解社会行为和种种集体的分析结构。理想型是经过考虑形形色色的观点并把许多个别现象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概念而形成的。比方说，我提出的禁欲主义新教在某一时间段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种植根于特定历史状况的理想类型。另一种理想类型是非历史的，但却更为普遍。比如，我写了很多东西讨论官僚制。”

“官僚……我真鄙视他们，”我颤抖着说，“在我行医的医院，我们的主管及其下属没完没了地制订各种规章制度。行政官员们使我无法依靠智识去行医。”

“要是没有规则会更糟，”韦伯答道，“官僚制有一些特征，在所有的机构中都能看到它。它把一个人的私生活和他在体制内的角色分开，制订打算囊括所有可能性的规则，这些规则在根本上是理性和客观的，并且基于所实行的不同程度的官僚制中的个人专业知识。尽管官僚制可能看起来不好，但没有它生活可能会更糟。它使社会保持稳定，让人们感到待遇平等；显然，个人的影响则微乎其微。”

“我认为这难以接受，”福尔摩斯说，“从理论上讲，官僚制会按您所说的方法运作，但实际上我时常看到人们想方设法地回避规章制度。”

“的确如此，”韦伯道，“在官僚制中，个人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我们对官僚制的看法与我们对权力的态度息息相关。我的理论指出，对权力的态度从传统形式中演化而来，惯例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比如，国王把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到了第二阶段，我们进入了我所谓的魅力型时期，某些领袖具有支配性的个人特征。对魅力的关注破坏了诸如国王这类传统的权力形式，又由于魅力型权威本身具有不稳定性，我称作合理合法的第三种类型便出现了。这个合理合法的阶段基本上就是官僚制。”

说到这里，韦伯教授似乎一下子垮掉了。他呼吸局促，突然间面如死灰。他瘫倒在椅子上。

“对不起，”他说，“我……我不能再说了。请原谅。或许我们以后还能继续讨论。我不知道何以如此，就是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我无法思考……一想到我糟糕的行为毁了我亲爱的妻子筹备的晚宴……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羞愧难当。”

“我是个医生，”我主动说，“我能帮助您吗？您需要医护吗？”

“不用，”他答道，“我感觉不好，但不是身体上的原因。我应该告诉您，我正遭受着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我很累。昨晚我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大夫在一起呆了好

几个小时，他也将会上发言并阐释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我们所期望的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他心肠很好，帮我处理了一些不必麻烦你们的事情。现在，我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和安静。我知道，我亲爱的妻子在为我担心……要是能休息一会儿，我会好的。”

“当然，”福尔摩斯说，“我们不必再谈下去了。等您休息好、感觉好些了，要是有必要，您再回来，我们从中断的地方接着谈。”

“好……听您的。”他有气无力地说。

说罢，他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一步步地走出房间。

“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又是一个十分悲伤的人，华生，”福尔摩斯说，“我读了他写的好几本书，我对他所拥有的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印象很深。他又是一个饱受折磨的人。我想，下面我们该请弗洛伊德大夫来谈谈。昨晚他曾和韦伯呆在一起，也许他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位教授的有意思的事情。你要是愿意，就让莱斯特雷德手下的人去叫他。”

“我正盼望能见到他，”我应道，“我认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有趣但又似乎过于牵强附会。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又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骗子。我真的期望能见到他，好问问他的一些想法。”

“颇有争议，毫无疑问，”福尔摩斯说，“华生，我必须承认我发现自己被他的理论吸引住了，其中的原委我眼

下还不能讲。我读了他写的很多书……你要是接受了他的前提,结论便顺理成章了。我认为,他对人类心理的洞察不同凡响。他本该成为一名出色的侦探。这位弗洛伊德大夫的确颇具争议,当然……要是他说得对,又会怎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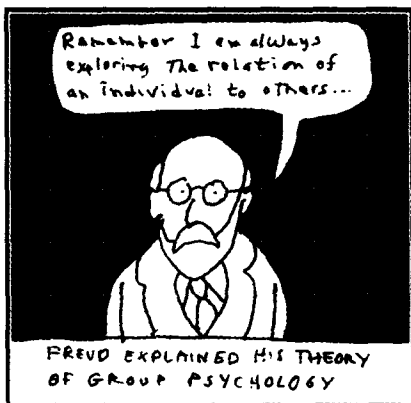
个体心理学与社会或群体心理学之间的差别乍看起来似乎意味深长,但经过更细致的研究之后便失去了锋芒。个体心理学的确关乎个人,探寻的是个人试图满足本能之途。然而,偶尔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个体心理学才有可能无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他人始终作为榜样、对象、助手或对手而参与其中,因此从一开始,个体心理学就同时是社会心理学……

因此,群体心理学关乎作为种族、民族、等级、行业、机构一员的个人,或者说作为一群人中的一分子的个人,这群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为着某个特殊的目的而组织在一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第七章

我们正等着会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我们正等着会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得承认我对要见他感到有点不安。我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对他的见识和思维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想象力印象颇深，因为我认为他的有些思想难以接受。弗洛伊德是一名医生，和我一样……但在我看来，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行医，转而从事人类心理研究。我不知道要期待什么。你时常对只读其书未见其人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样抱有相当可笑的想法。

“他是什么样的人，福尔摩斯？”我紧张不安地问道。

“你会以此为乐的，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说，“我多次与他见面，总是很愉快……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也为一些个人的原因。要知道，在你和他讨论的任何话题中他都会超前五步，尽管放松从中享受好了。”

响起了敲门声。莱斯特雷德手下的一名警员开门。

“弗洛伊德大夫到了，先生。”他通报说。

“好，”福尔摩斯说，“请领他进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进来了。他比我想象中要矮得多。他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眼镜框很厚，正抽着一枝长雪茄。

福尔摩斯起身迎接弗洛伊德。两人握手。

“啊，弗洛伊德大夫。很高兴又见到您了。”他说道。

弗洛伊德神妙莫测地微笑着。

“很愉快又见到您，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声音轻柔而又沉稳。

“这位先生，”福尔摩斯转向我说，“是我可靠的朋友华生博士。他在很多案件的调查中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走上前去同弗洛伊德握手。

“华生博士。很荣幸能见到您，”他说，“在福尔摩斯许多有您协助调查的案子里，我一直注意着您的一举一动。我总想知道您本人到底什么样子，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找到答案了。人们自然想知道他们在书中见到的人或

所读之书的作者到底什么样。毕竟，我们都是好奇的动物。”

我不禁骇然，我得承认。弗洛伊德好像能看穿我的心思。

弗洛伊德就座。他看上去很放松。他具有一种可称作无忧无虑的性格。他的眼睛炯炯有神，面部表情欢快而顽皮。

“福尔摩斯，我猜您想要知道我昨晚和马克斯·韦伯谈了些什么。”他说道。

“对，”福尔摩斯答道，“我不知道韦伯教授是否知道，就在昨天他的妻子聘请我来防止他陷入困境或受伤害。她说，他在德国已经受到过威胁。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参加今晚由比阿特丽斯·韦布举办的晚会……万万没想到韦伯的妻子昨晚竟会如此唐突地安排一次晚宴。我想您也在场。就在晚宴上，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被盗，韦伯和涂尔干争论起来并导致韦伯拳打涂尔干。”

“对，我在场，”弗洛伊德说，“玛丽安娜·韦伯可能会告诉您，韦伯参加会议的原因之一就是同我见面。他曾写信给我询问是否有可能给他治疗，我们安排好昨晚给他看病。结果没想到他太激动不安了，尽管考虑到此前发生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要说我对您深表同情，”我热烈地答应道，“我有不少病人有相似的经历。这肯定会给您造成很大困难。”

“给我造成困难？对！但韦伯教授更困难。现在，警

察来调查珠宝失窃案，两位名满天下的社会学家之间发生了斗殴，如果能这么说的话。今早，我去涂尔干的房间，发现他不在。我去饭店前台查询，发现他的钥匙还在匣子里，所以我想涂尔干失踪了。或许他出了什么事，尽管我认为这不大可能。一个有丰富旅行经验的成年人，在一座像伦敦这样的城市里一夜未入住他的旅店房间，我不该为此过于激动。我想，这不是你们最关心的事情……毫无疑问，你们是为着珠宝失窃案而来。”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

“真了不起，弗洛伊德大夫。您说得对。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找到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物归原主。可怜的女人为钻石的丢失极度沮丧。我也在关心涂尔干教授没回房间一事。人们在泰晤士河边发现了他的钱包，警察认为他可能遭劫后被人谋杀了，尽管我要说我对涂尔干是否真的死了持保留态度。人们有很多缘故不在饭店房间住宿。”

“我也这样认为，”弗洛伊德说，“对他不在饭店房间和钱包的发现有种可能的解释。他可能遭劫了，但这和被谋杀不是一回事。我相信，等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好地解释他不在的原委。我们偏离正题了。您想要知道我和马克斯·韦伯谈了些什么，我这就告诉您。”

“好，”福尔摩斯坚定地说，“我们还是要保护教授，不让他人有意伤害他。眼下，我们必须更加注意不让他自我伤害。”

“我们必须把抑郁症和通常意义上的抑郁区分开，”弗洛伊德说，“人们一般认为抑郁意味着悲伤，是一种绝望和沮丧的感觉，如此等等。在精神分析思想中，抑郁症是一种临床综合症状，时常伴随着思考困难、沮丧和衰弱的精神运动。抑郁症患者对外界的关心不断减弱，自我批评逐渐增强，产生一种悔恨和内疚感……这可以看作自我侵犯。抑郁症也伴随着满腔怒火，一般针对自己，但也会针对外界。这就是韦伯拳打涂尔干教授的原因。”

“我现在明白了，”我说，“抑郁症患者的愤怒可能会指向外界，指向他人，这就是导致韦伯不得体行为的原因。”

“对，”弗洛伊德答道，“我们总是怀疑难以治愈的抑郁重症患者会自杀或杀人。我要多说两句。抑郁症常常因失去某个亲爱的人而起，我们心理学家称之为‘对象丧失’，但这和哀痛绝不是一回事。抑郁症患者因丧失了亲爱的人而自责，这一丧失调动起了种种被压抑的愿望和无意识的自恋苦行。也就是可怕的不称职和内疚感等。”

“众所周知，韦伯曾与他的父亲发生过争吵，几周之后他父亲就去世了，不久他患了抑郁症。韦伯因此认定他对父亲之死负有责任，也为无力挽回此事而极度烦恼。我想你们看到韦伯教授没有多少自觉感情，他行动迟缓，同他人很疏远。这是预料之中的事。1897到1903年间，他的状况有很大转机，部分得以康复。从那时起，他开始迅速好转。我认为，他目前已经能开讲座、尽教授之责

了,尽管还有不少困难。

“看起来,韦伯对他的父亲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昨晚我得知,他18岁在海德堡大学时加入了他父亲曾加入过的决斗会,大学期间他像父亲一样学的是法律。他似乎经历过人格和体质上的转变。他原本瘦弱而少言寡语,但在海德堡期间,他变得体格健壮并且多少成了一个喜欢热闹、无是无非的享乐主义者。他后来又转变了一次,不再对父亲认同,转而认同他的一个叔叔。

“此外,他曾与一个患有精神病的表妹订婚,婚约维持了不少年,最终还是解除了。他后来向另一个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求爱,她当时看中的是另一个人,韦伯获取了她的芳心并于1893年与她结婚。但他从未真正完婚,他至今尚未与任何女人有过性关系。”

“天哪,”我叹息道,“多么复杂的一个人。这回我不羡慕您。压根不羡慕。我可不愿意给韦伯教授治病。决不!”

“对,”他答道,“没错。复杂之人常有不少情结,这您会想到吧。”

随后他笑了起来。他能如此坦然地面对我认为很重而犯愁的事,我不胜惊讶。弗洛伊德注意到了我的表情。

“同其他事情一样,华生博士,尽管某个病例可能会带来许多困难,您还得保持幽默感。您得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客观意识,以免被这位或那位患者的病魔之力吞没。

您肯定知道，外科大夫时常用开玩笑来保持勇气。我们从事精神分析活动的人也是如此。幽默是我们避免焦虑之道。”

“我明白了，”我答道，“我时常想，正是由于高度发达的幽默感，福尔摩斯才能不断应付他作为一名私家侦探所面临的许多困难。”

“我们再来看韦伯，”弗洛伊德说，“大约五年前，也就是1904年，韦伯前往美国旅行，那次经历似乎对他影响很大。正是在那里，他开始考虑新教各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官僚制的重要性。他回来后状态不错，但从临床上看仍未摆脱抑郁。作为一名满腔怒火的抑郁症患者，他一般对自己发火，但也会对别人怒气冲天。因此，他很可能攻击涂尔干。据我所知，涂尔干是一个非常温和体贴的人。如今，犯罪感肯定占据了韦伯教授的全部身心。他不知道涂尔干教授还没回自己的房间。我想其他人也不知道。因此，韦伯教授的处境十分微妙，必须小心监控他，以免他对别人或对他自己鲁莽行事。”

“您说的鲁莽行事是指自杀这类事情吗？”福尔摩斯问道。

“的确如此，”弗洛伊德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米尔·涂尔干对这一主题做出了最重要的社会学阐释。我担心韦伯教授的处境有些危险。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曾受到别人的威胁，可我担心他对自己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此外，有理由相信他的经济状况有些朝不保夕。考虑到

这一点,尽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仍然可以设想假如韦伯看见地板上的钻石,可能会把它装进衣袋里,然后再藏到别处。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可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干,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极其死板和非常守旧的人。”

“我对您来此治疗韦伯能够理解,”我说,“可我不明白您在一个充斥着社会学家和与政治有染者的会议上要干什么。我向来认为您的领域是个人心理、人的精神。”

弗洛伊德微微一笑。

“华生博士,您得记住,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他人始终作为榜样、对象、助手或对手而参与其中,因此从一开始个体心理学就同时又是社会或群体心理学。别忘了我始终都在探索个人与他人即双亲、兄弟姐妹或所爱之人等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群体心理学关乎作为种族、民族、等级、行业、机构一员的个人,或者说作为一群人中的一分子的个人,这群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为着某个特殊的目的而组织在一起。

“让我再补充一下,我关于群体的观点曾受到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邦的影响,我认为他的思想令人信服。正如勒邦所说,群体盲目轻信、易受影响而且没有批判能力,离奇之事不会为群体而存在。群体基本上用形象来思考,这些形象通过联想发生联系……正如个人在自由联想状态时的情形一样。这些形象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从未受到任何合理功用的检验。群体永远需要幻象,没

有幻象就活不下去。”

“对，”我趁他停顿时若有所思地说，“很有道理。”

“您认为我的观点有说服力，我很高兴，”弗洛伊德说，“重要的是要把群体心理学与涉及个体心理学的一个话题即力比多联系起来。我认为力比多同涉及‘爱欲’的本能有关，从根本上与性爱和性欲有关。但它也关系到自爱、父母之爱、妻子之爱、孩子之爱，总的说来，就是人类的友情与爱欲。在我看来，爱欲是我所谓的‘群体心理学’的组成部分。例如，我在诸如教会和军队这类高度制度化的机构中也能发现它，尽管它一般处于隐蔽状态而且机构成员也没有意识到有这类感情。”

“精神分析的证据表明，两人之间几乎每一种亲密感情如婚姻、友谊、亲子关系在维系一段时期之后总是要留下反感和敌视，这些感情起初通过压抑来消除。人们在一个更大的单位相处时同样如此。”

“啊哈！”福尔摩斯说，“我知道如何来解释可怜的韦伯教授的困境了。”

“对，我相信您会明白，”弗洛伊德说，“我们可以综合起来判断。在我的理论中，我指出认同是与他人维系感情的最初表现形式……他人就是我原来用精神分析术语所说的对象。这与抑郁症有着某种关系，而在抑郁症中，真正失去或从情感上失去某个所爱的对象是最显著的病因。这类病例中，对自我残酷的自贬，同时伴随着无情的自我批评和痛心的自我责备，则是其主要特征。这就是

我们在韦伯教授身上所看到的,尽管他近年来已有很大好转。

“当然,韦伯教授不过是个体而已。我们时常看到在由许多个体组成的群体即我所谓的初级群体中,人们会以同一个对象来取代自我理想并且最终相互认同。他们之间强烈的感情纽带可能就是他们感到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的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发展了所谓的‘群居本能’,尽管我指责这一概念没有给领袖留下余地。

“在我关于这一主题的演讲中,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讨论社会之初原始游牧部落之父的神话。他被颂扬为世界的创造者,因为他生产了构成最早群体的子孙。他是每个人的理想,人们对他又敬又怕,这便产生了后来的禁忌观念。有不少人最终联合起来杀了他,将他碎尸万段。胜利者中无人能够取代他的位置,要是有人取代,战争又会重新开始,他们终于明白了必须摒弃父亲的传统。后来,他们组成了图腾崇拜的兄弟团体,其中人人权利平等并且统一在图腾禁令之下,这些禁令将保存和抵偿谋杀记忆。

“该群体中可能会有一人脱颖而出接替了父亲的角色。他通过创造英雄神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声称独自战胜了父亲,父亲变成了图腾怪兽。通过英雄神话,有人能够摆脱集体心理的控制并居于支配地位。

“还有一点应该提一下,”弗洛伊德继续说,“我的理论指出,人生而好斗。人不是想得到爱并在遭受攻击时

最多只是自我防御的温和动物；恰恰相反，人这种动物的本能中有着强大的攻击成分。因此，问题就出来了，文明如何来约束这种攻击性呢？Homo homini lupus，他人即狼。于是，人的攻击性形成了内心形象、内在化了；它被遣送回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指向人的自我。

“自我的一部分取代了攻击性后又转而针对作为超我的自我的其他部分。因此，文明控制个体危险的攻击欲的手段是削弱、解除它并且在其中设置代理来监控它，就像派兵驻守一座被攻陷的城池一样。”

“您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我说，“毫无疑问，您的理论的确不同凡响。它不属于我所熟知的那种……可能是由于我无缘亲聆您的专题讲座的缘故。您说，他人即狼。我对此表示赞同。此外，您关于派兵驻守一座被攻陷的城池的隐喻很恰当。”

“您在我即将出版的著作《图腾与禁忌》中将会看到对这一理论更为全面的阐述。这是我关于该主题的四次演讲的合集，”弗洛伊德说，“我想说，还有另一件事与韦伯教授的事有点关系。还记得我说过韦伯没能与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完婚吧。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我认为，自我会运用压抑、倒退和升华等多种防御机制来抵挡焦虑。我要说的是，韦伯教授已经升华了，他把自己的性冲动转向或改为著书立说，这就是他作为一名学者如此多产的原因。我说过在教会和军队这类地方性欲受到抑制却不为意识所知，还记得吧。我发现，在这

些机构和无数其他机构中会出现同样的升华现象，个体间通过认同同一目标来相互认同，同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压抑性欲。我要补充一句，人们知道韦伯与其母关系异常亲密，这意味着他的阳痿背后可能有某种恋母情结……我现在不想再深谈这个麻烦的话题。”

“真遗憾，”福尔摩斯说，“您没有做私家侦探，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您能在这行当中与我匹敌。”

弗洛伊德被逗乐了。

“可我所从事的工作与您的工作极其相似，福尔摩斯，”他说，“我俩都对人的动机感兴趣。您关心的是罪犯，其行为是由形形色色的力量所造就的，很大程度上与人格中的阴暗面有关。我关注的则是个体，绝大多数是神经病患者，其行为是由无意识决定的。我认为精神包括三个部分：意识、我们若有所知的前意识和无意识。无意识是精神的主体，因受压抑而对我们封闭。

“我还以我的结构假说来分析精神，假定自我在一场不间断的斗争中力图控制本我和超我这两个相互争斗的力量，前者是沸腾骚动的内驱力的代表，后者则是我们的道德感情。罪犯多半缺乏足够的超我因素，他们的自我无法控制支配其行为的本我。我的病人通常缺乏充分的本我之力，一旦缺少充分发达的本我即快乐欲，我们的自我就会弱小，我们的精神就会遭受超我的过度控制。自我力图帮助我们适应世界并在其中活动，一旦精神的某个因素过于强大，在极端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罪犯和神经

病患者,有时还会合而为一,那就是患有神经病的罪犯。”

“您认为窃取布拉克内尔夫人钻石的人是患有神经病的罪犯吗?”福尔摩斯试探道。

弗洛伊德对该问题善意地一笑。

“大多数罪犯并非严重的神经病患者。他们通常执著于金钱欲并且使用不为我们认可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我对晚宴上的人并不都十分了解,因此不能指认谁会窃走钻石,尽管好几位我从前都见过。他们没有一个像是罪犯,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有人一时软弱没抵挡得住诱惑。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布拉克内尔夫人伺机偷走了自己的钻石。假如她的经济状况很窘迫,钻石的保险金能解燃眉之急。鉴于有时人们会受欲望的驱使而做蠢事,这种事不是不可能,而是有极大的可能性。

“福尔摩斯,我和您一样始终在寻找能帮助我解开人类行为之谜的钥匙。您寻找为大多数人所忽视的犯罪线索,用您超常的智慧力量来破案。我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我一直在寻找动机线索,在只言片语中、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或与过去经历的关系中以及人们与梦的关系这条通向无意识的捷径中寻找线索。啊,福尔摩斯……我比您所认为的更像您,只不过我着力解决的是人们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以及事后给所爱之人带来的痛苦。我俩都是侦探,说真的!”

“果真如此,”福尔摩斯笑道,“我是说您本该做一名出色的私家侦探嘛。可我们都得听天由命,我也不想让

这个世界丧失您所做出的成就……或即将做出的成就。当然，您已经医治了不计其数的人。”

“治疗病人？不过是移情罢了，”弗洛伊德笑道，“您真是个好人的。我现在还要准备我的讲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要向您和华生博士道别了。”

弗洛伊德起身告别，我上前同他握手。

“见到您我说不出有多高兴，”我像个小青年一样深情地说，“说实话，您的见解使我大为震惊。但我承认，如果接受了您最初的假设，后面的结论便顺理成章了。”

“谢谢您，华生博士。”弗洛伊德说道。

“我可能还会拜访您，”福尔摩斯说，“要是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的话，我相信您会答应的。”

“那是当然，”弗洛伊德应道。“我有幸见到了埃米尔·徐尔干，我盼望还能见到他。您当然知道，我们对自杀和其他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我现在需要一支上好的雪茄……然后我要继续写我的讲稿。”

“我对您在象征方面的研究很着迷，”我说，“雪茄在您的思考中似乎是一个突出的象征。”

“对，”弗洛伊德答道，“但您得记着——有时候，雪茄仅仅是雪茄而已。”

“谢谢您。”弗洛伊德离开房间时福尔摩斯说。

“此人，”福尔摩斯说，“是一位相当重要的思想家。我认为，尽管他的思想针对的是人的精神问题，却会给社会学家和其他人类问题研究者带来巨大的效益。”

福尔摩斯难得如此情不自禁，但他在品评人的才智方面是个行家里手，就我所知，他在评价我们所识之人时从未出过差错。因此，我决定结案后要亲自去研读弗洛伊德大夫的作品。弗洛伊德说过，他人即狼。鉴于我协助福尔摩斯办理的许多案子，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一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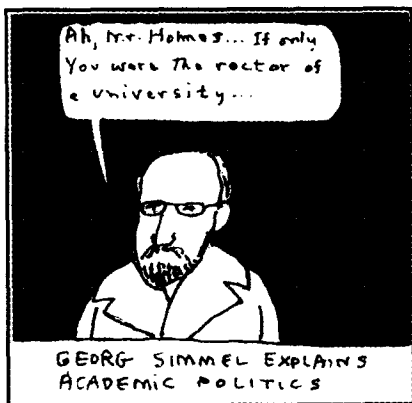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掏出烟斗，填满烟草，抽了起来。“一支上好的烟斗和一些优质烟草……你要严肃地思考点什么的时候，它们非常管用。此案要深思，华生，要深思啊。可我相信，我知道涂尔干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也可以解释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的下落。我们不久就能证实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在一个融合了种种事物和力量的庞大机构中，个人不过是一颗螺丝钉。所有的进步、神性和价值都是从个人手中夺去后从主观形式转化为纯粹客观生活的。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正是这种超出一切个人生活之文化的真正的场所。在建筑物和教育机构中、在征服太空技术的奇迹和慰藉中、在社区生活的形成中和在国家的现有机构中，处处都充满了定型的、非人格化的精神，可以说，人性在其影响之下难以为继。一方面，由于各种刺激、利益、时间与意识之用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生活变得极其舒适。人在其中只需随波逐流，几乎不需要亲自游泳。另一方面，生活中非人格的内容和物品越来越多，大有取代真正人的特色和对抗之势。因此，个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本质，极尽所能地表现其与众不同和独一无二性。甚至为了让自己听得见，他不得不夸大这一个人的因素。

—— 格奥尔格·齐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

第八章

我们约见的第二位教授



我们约见的第二位教授是来自德国的另一位学者格奥尔格·齐美尔。我从未听说过此人。福尔摩斯告诉我，他在学术圈子里声望很高，有不少非同寻常的有趣想法。我在弗洛伊德那里所见到的非同寻常的想法足够我揣摩一上午了……可能是一生。因此，会见齐美尔教授是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福尔摩斯的立场很坚定。

“我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他提醒我，“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齐美尔身材瘦长，胡子整洁，戴着一副眼镜，身穿一套在我看来做工精美、价格昂贵的衣服。早先，韦伯拖着脚走进我们的会见室，齐美尔正好相反，他步履轻松，面带微笑，显得心情舒畅。

“我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说，然后指着我道，“这位先生是我的密友和同事华生博士。”

齐美尔同我们一一握手。我注意到，他握手时很有力度——是个性格坚定的人。

“可以请您就座吗？”福尔摩斯指着那把韦伯和弗洛伊德曾坐过的椅子问。

“啊，福尔摩斯……您要是大学校长就好了。”齐美尔笑道。

“对不起，”我插话道，“我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让我来解释一下，华生，”福尔摩斯说，“齐美尔教授是一位一流的思想家，他写过不少重要的著作和文章。但他从未在德国的大学里得到过教席，也就是终身教授的职位，因为，对此我感到遗憾，这些院校有不少反犹太主义的教授鉴于他的犹太人身份反对他获得稳定的职位，这不过是桩丑行罢了。”

“您说得对，”齐美尔笑道，“我多年来始终是个局外人。我曾在柏林大学长期任 *Privatdozent*^①，即无薪讲师，靠

① 编外讲师。——译注

学生的学费为生……后来又做了 Ausserordentlicher^①，这纯粹是个名誉职位，我没有资格参与校方事务。平心而论，还有其他原因，尽管都不太重要。我的兴趣很广泛，不少教授认为我无法归属任何学科。不知怎的，我身处传统学科界限之外。”

“事实上，我是个很受欢迎的讲师。在我看来，我的不少同事的烛光并没有照得那么亮，他们对我在大学的存在并不欣赏。我常说，平庸总是喜欢结伴而行，在大学和在任何机构里都是这样。人们公认的杰出人物马克斯·韦伯极力为我争取教授职位而未果。对他为我付出的努力，我非常感激。可惜，像他这样的人不多。我们与另一位教授一起创办了德意志社会学学会，旨在确立这一学科。我可以把马克斯称作朋友，却不能称作同事，唉。

“幸亏我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因此我虽然没有得到我认为该得到的荣誉，但这并不要紧。不做大学院系的成员也使我得以脱身从事于我的思考和写作，这部分由于我是一个局外人，在不少大学学者看来，或许还是个异客。

“瞧，我是个冷嘲者，”他又说，“我付出很多，从学校得不到回报，不少无所事事者却收获颇丰。我眼中的生活令人啼笑皆非，终归不过是一场滑稽剧。我相信，那些在柏林大学和德国其他院校阻挠我获得教授职位的学者们在有生之年都心照不宣：他们无足轻重，不会有什么重

① 非教席教授。——译注

要的学术成果传诸后世。他们的生活通常狭隘而草率，满足于经营大学的区区小事并通过驱逐像我这样的自由人来实现自我。我之所以自信，是由于我知道我的思想和著述会有某种深远的意义。我想创办一所研究日常生活的研究所，我已向布拉克内尔基金会提出资助申请。这对我的事业……和理论比较重要。”

我为齐美尔与可怜的韦伯教授如此不同而感到吃惊，后者似乎毫无生气，对自己满腹疑虑。

“我对社会学这门新学科所知甚少，”我说，“我刚在这里从韦伯教授那里听到一些。您的工作和他一样吗？”

“不，华生博士，不一样，”他答道，“我们都对同一桩事情感兴趣，即人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但我们的研究方法不同。例如，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如同有机体，因此可以采用自然科学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并专注于人类行为的宏大而普遍的法则。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不过是个抽象概念，实际存在的不过是个体，因此个体的行动才是社会学的主题。我的观点正好居中。要说社会学是研究人类一切所作所为的最重要的科学，那不啻是自我拆台、过于自我膨胀。我把社会视为相互作用的个体之名。因此，社会学研究可以被称为‘社会通论’，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模式和形式。

“社会学质问的是我们自身的事和人们的行为规则，所涉及的不是个体存在，而是所形成的群体、群体中的身份对个体的作用以及群体内个体间的互动。我感兴趣的

是社会最小单位即个体间的互动,但我向来关注的是互动和不同类型的互动中的同一性或形式。因此,我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类型感兴趣,如异客、叛徒、穷人……”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福尔摩斯说,“还有局外人。”

“对,是这样,”齐美尔笑道,“局外人及其对立面局内人。我们都知道,概念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对立面。在有局内人的情况下,才会有局外人,要是没有富人,也就不会有穷人。福尔摩斯,我从您的话里听出您的意思是说社会学工作中可能存在一种强大的尽管是隐蔽或者被掩盖的自传性成分。”

福尔摩斯笑了:“我曾与有此想法的名人对过话。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我们的过去,也无法逃避我们的经历。”

“对,对,”齐美尔说,“是这样。我们既是个体又是社会性动物。人并非半社会半个体之物,而是由一个基本的统一体所造就的,除了用两个在逻辑上相对照的决定因素之间综合或一致的关系来解释之外,别无他法:人既是社会的纽带又是自我的存在,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来自自主中心的生命。个人能够决定社会,同时社会亦能决定个人。这就是社会如此迷人的原因。”

“可是,齐美尔教授,”我插话道,“我不明白两者如何并存。要么社会造就人,要么人造就社会。总有一方得居先,不是社会就是个人。”

“不,华生博士,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有一种互补关

系在起作用,个人由社会所造就,同时又造就了社会。我们在许多行动中都能发现这种互补行为,尽管通常并不容易看见。试想一下等级现象,在某个机构或实体中的上下级关系。统治不仅仅是个权力问题。要是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上下级之间通常存在某种交换关系。通常,那些位居机构高层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依赖于那些地位和权力比他们低下的人。

“唉,在一个融合了种种事物和力量的庞大机构中,个人不过是一颗螺丝钉。所有的进步、神性和价值都是从个人手中夺去后从主观形式转化为纯粹客观生活的。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正是这种超出一切个人生活之文化的真正的场所。在建筑物和教育机构中、在征服太空技术的奇迹和慰藉中、在社区生活的形成中和在国家的现有机构中,处处都充满了定型的、非人格化的精神,可以说,人性在其影响之下难以为继。

“当然,我们也能做一些事……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可以从属于多个不同的机构,他在有些机构中是上级,而在另一些机构中又是下级。一个人从属的群体越多,他的活动范围就越大,这标志着他的文化水平。这迥异于前现代社会,那时的人属于行会和亲属团体这类不多的几个群体,并被牢牢地控制着。现代人是自由的,但伴随着自由而来的是被现代社会中现存价值压倒并征服的危险。前现代的人几乎没有自由。现代人的自由似乎太多。我们总是一方面被我们文化发展所需的种种事物吸

引,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它们。”

“说到社会互动,有个话题会让您很感兴趣,”福尔摩斯说,“昨晚,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被盗,您的朋友韦伯与埃米尔·涂尔干发生争斗,您能就此谈点什么吗?”

“这真让人感到苦恼,”齐美尔道,“我无法解释布拉克内尔夫人钻石的下落。韦伯拳击涂尔干时,她晕倒了。有个侍者在她身边,于是抓住了她,以免她倒地摔伤。大伙将她团团围住。真是一片混乱。一两分钟之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给她做了检查,说是没什么问题。然而,没一会儿,她发现钻石不见了。我们都去找钻石,但没有找到。她的金链子在地板上,但钻石已被人拿走,可能藏在了什么地方。警方把饭店搜了个遍,结果一无所获。我不相信当时在座的哪一位会堕落到拿走钻石的地步。警方也搜查了所有的厨师和侍者,同样没有结果。我感到大惑不解。在混乱无序的状况下,我所说的人类互动的重要性不大灵验了。”

“至于马克斯·韦伯,我说过他是我的密友,曾多次为我争取教授职位。目睹他拳打可怜的涂尔干,我感到十分震惊。涂尔干的个头比韦伯小得多,他似乎被韦伯贸然举动惊呆了。他们一直在热烈地讨论韦伯所提出的个体行为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性问题,突然间,韦伯却打了涂尔干一拳。涂尔干似乎为此感到羞辱,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餐厅。此前,那可以说是个其乐融融的夜晚。”

“要是韦伯患有抑郁症的话,”我问齐美尔,“您如何

解释他的打人行为呢？这我不大明白。”

“抑郁症患者的自控力很差，一般说来他们待人冷漠、满腹自责，有时处事也会没有理智，”齐美尔答道，“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要是玛丽安娜没有安排这次晚宴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想，她这样做是为了让丈夫高兴，”我说，“与朋友们共享美餐总能让我们兴致勃勃。”

“是这样，”齐美尔说，“但是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难道说韦伯的妻子安排这次晚宴是为了让他陷入困境？她是希望……如果这个字眼合适的话……会发生这种事？我真难以相信。”我说道。

“当然不是，”齐美尔说，“请记住社会学家也在寻找人类相互作用中深藏、潜在和隐蔽的方方面面。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涉及我所谓的‘二人组合’时，沿着统治、服从和权力关系这些路线，我们发现夫妻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玛丽安娜可能认为晚宴会对她丈夫有益，尽管如此，您得承认她将他置于一个他无法成功应对的险境。”

“何以如此？”我问道。

“这不好说，”齐美尔道，“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行事处世的真正原因。要是知道的话，社会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或者说任何社会科学都没有必要存在了。恰恰是因为人们没有、不能或不想认识他们在诸多不同的社

会互动中的行为的原因，社会学才会如此重要。为何恰恰是玛丽安娜这样一位令我尊重的可爱的女人在明知丈夫身处险境并且对己对人构成威胁的情况下筹办这次晚宴，你难道不感到奇怪吗？你们见过马克斯·韦伯，也对他的种种问题早有所闻。他的心理问题源于家族史，但我要补充一点，也源于他与玛丽安娜的关系。她爱他，可她有时在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情况下会以不同的方式协助他损害自己。”

“有道理，”福尔摩斯说，“在我参与的不少案子里，我发现受害者时常设法协助那些迫害者。我们必须理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亲手织就的一张乱网。我们自以为能预见未来，但按您的想法，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后面的真正动机尚且懵然无知。韦伯的妻子不可能预见到韦伯会和涂尔干就社会理论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并且导致他拳打涂尔干，然而，完全可以肯定，举办这次晚宴对可怜的韦伯来说是一桩坏事。”

“对涂尔干来说也是如此，”齐美尔应道，“我们要记住，玛丽安娜·韦伯的愚蠢的牺牲品是两个人，她的丈夫和埃米尔·涂尔干。我想后者并未受到严重伤害。然而，由于羞辱感，他可能觉得有避开他人的必要。要么他可能身体不大舒服。你们知道吗？”

“我们还不知道涂尔干教授的情况，”福尔摩斯道，“但我们不久就会知道，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会出席布拉克内尔夫人今晚举办的晚会。”

“我真希望如此，”齐美尔说，“那会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我的问题问完了，”福尔摩斯说道。

“既然没有问题了，我要回到我亲爱的妻子身边去，她正等着我。”

“好吧，”福尔摩斯答道，“在您走之前，我要告诉您，我觉得您的想法非常有趣。毫无疑问，今早是近年来在智识上最使我感到振奋和具有挑战的早晨。竟然还没到午餐时间。”

“谢谢您，”齐美尔道，“或许，您多少也算是个局外人……像我一样。我知道您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具有非凡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您没有选择做社会学家真是太遗憾了，因为这个行业能从您这种人的大智慧和高度敏锐中获益匪浅。您可以把我的话看作一种邀请。”

“一个局外人向另一个局外人发出的，”福尔摩斯应道，“那么局内人会对此说些什么？”

齐美尔笑了。他走后，我转向福尔摩斯。

“涂尔干今晚参加晚会？就我所知，这个可怜的人昨晚已被杀害了。”我说。

“不对，华生……我对涂尔干之死深表怀疑。我们不久就会发现真相。今天上午真不寻常，华生。我感到非常有趣，也希望会有用。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已经饿极了。”

我看了看表。

“快 10 点了，福尔摩斯，我很想吃顿早餐。克拉里奇饭店的早点很丰盛，我提议暂停一会儿，去吃点东西。在你给我捎信来之前，我就喝了杯茶，吃了点吐司。”

“好主意，华生，”福尔摩斯说，“我也想吃点东西。我们去吃些早点，好以充沛的精力重新投入工作。”

“现在，我们要安排好下面的会谈。”

“会是谁呢，福尔摩斯？”我问道。

“正是大名鼎鼎的俄国革命家弗拉基米尔·列宁，”福尔摩斯说，“劳驾你让莱斯特雷德的手下在一小时之后把列宁叫来，多谢。”

我起身把头探向走廊，莱斯特雷德手下的一名警探正守在那里。

“福尔摩斯请列宁一小时后来面谈。”我告诉他，然后转身面对福尔摩斯。我的好友正在沉思。

“我们去吃早点吧，”他说，似乎在努力弄清什么事情，“我承认，华生，我也饿了。”

“齐美尔说起想要创立一家研究所来推进自己的工作……并且正在向布拉克内尔夫人的基金会申请资助，”我提醒他，“你认为他会把钻石装进衣袋并藏起来吗？我感到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

“我想，太聪明了就不会干这样的蠢事，”福尔摩斯答道，“尽管我们不知道人们在遇到实现自己野心的机会时会干什么，我不相信他是珠宝窃贼。等我们调查了所有的人之后，我们才能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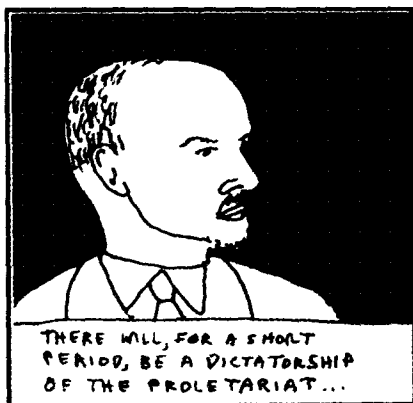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弗拉基米尔·列宁《国家与革命》

第九章

克拉里奇饭店最后一轮午餐时间



克拉里奇饭店最后一轮早餐是在 10 点钟。尽管我们来得晚，由于这些年饭店经理们得到福尔摩斯不少帮助，欠他人情，我相信我们应该会有东西吃。克拉里奇饭店的经理维托里奥·塞滕布里尼看到我们朝餐厅走来，赶忙迎上来领我们就座。

“很荣幸能为您和您的同事华生博士提供早餐，我们以此表示敬意。”他边说边吩咐一位侍者为我们服务。他对侍者的反应甚为满意，便匆匆离去，又卷入了饭店数不

清的事务之中。

我环顾四周，餐柜中摆放着瓷茶壶，已准备好了中国茶和印度茶，还有盛满咖啡、闪闪发光的银壶，壶旁边是一碟碟烤饼和吐司，五颜六色的罐子里装满了果酱和蜂蜜。在另一个餐柜中，我兴奋地看到一排银盘子盛着荷包蛋、熏肉、香肠、火腿、腰子、鳕鱼和鲑鱼。第三个餐柜提供的是各色冷肉，有牛肉、舌、火腿、野鸡、松鸡和山鹑。旁边还有多种温室水果，瓜、蜜桃、桃子、草莓、紫莓。

“我们饿不着了，福尔摩斯。”看到有这么多的食品可供选择，我热切地说。我得承认，思考了整整一上午之后，我饿坏了。

“别担心，华生。”

福尔摩斯转向侍者。

“我想来点咖啡和一小罐奶油，一碟瓜、烤饼和紫莓酱，两只炒蛋和四片熏肉，”他说，“应该足够了。你呢，华生？”

“我想要点火腿、野鸡、荷包蛋和吐司。我还想来点红茶和奶油。”

“谢谢。”侍者说完便匆匆离去。几分钟后，几位端着大托盘的年轻人出现在我们桌旁，侍者给我们摆上所点的食品。

“你捎信来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吃顿像样的早餐，当时真感到沮丧，这下足以弥补了。要论美食，没有一家能超过克拉里奇饭店。”

“我们省了一大笔钱，”福尔摩斯应道，“多亏经理慷慨。这家饭店价格昂贵。会议在此召开让我感到有点奇怪，我想这些学者和作者将会谈论舒适安逸问题。过着奢华生活的人会更加相信社会进步。”

“好了，福尔摩斯，”我说，“发言人都是些知名人士，你不会指望他们愿意身居陋室吧，再说此次会议是一桩引人注目的事。试问，除了克拉里奇饭店还能选择何处？”

食物相当可口。我得承认，我吃得狼吞虎咽，福尔摩斯却在一点一点地吃。

“也许，”福尔摩斯说，“我们下面要见的是弗拉基米尔·列宁，有人会说他是个自封的工人阶级的捍卫者。他会呆在一家有贵族、百万富翁这种阔绰人士频频出入的饭店，你难道不感到奇怪吗？”

“一点也不，”我答道，“会议主办者会为他付款的。无疑，他住不起这里，但很少有人不愿意花别人的钱。我可能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我愿意指出这是一个社会法则。”

福尔摩斯笑了。

“我担心今天上午与社会理论家们的交谈让你中毒不浅，亲爱的华生。”他说，“与社会学家如此短暂的接触之后，你开始提出理论和法则了。到了今晚，你会再也做不到了。”

我们正在用餐，有一个轮廓分明、比我们年轻的人走

过来问是否可以和我们坐在一起。

“我刚吃完早餐，”他说，“就看到你们坐在这里。我断定您就是著名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而这位先生，”他指着我说，“就是您的同事华生博士。我想你们正在调查昨晚所有出席宴会的人。”

“您说得对。”福尔摩斯说。

“我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列宁。”他说。

我在报刊上见过列宁的照片，但这些照片都没捕捉到他的风度。他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个性如此鲜明。我感到他活力四射，意志顽强。他已秃顶，额头宽阔，鼻阔唇厚。他的外貌具有鞑靼人的某些特征。他的眉毛浓密、留着上髭和修剪整齐的尖胡须。眼睛可能是他最突出的部分，小而深陷、敏锐有神。他穿着一身某种粗糙料子制成的深色衣服。

“先生，感谢您愿意接受调查。”福尔摩斯说。

“我和警方打过不少交道了，”列宁平静地说，“至少我相信今天上午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会把我送交警察局。在英国不会发生这种事……至少我希望不会！”说完他笑了。“我认为昨天晚宴上的事件太有趣了——盗窃珠宝，这是资产阶级最传统的罪行，暴力袭击了一个毫无提防的受害者。我得承认，虽然我没有偷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我对偷窃者却抱有些许同情，此人竟被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则逼得铤而走险。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

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因此,我们时时会看到个人反抗这种可怕统治的事例是很自然的……反抗方式可能会是从富豪那里窃取无用的珠宝。”

“您不必担心警方会得知我们谈话的内容……或其他事情,”福尔摩斯说,“能劳驾您尽可能告诉我们昨天晚宴上发生的事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列宁答道,“晚宴令人很愉悦,我正在和比阿特丽斯·韦布交谈,突然被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的声音打断,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并且开始向对方大喊大叫。涂尔干正在指责韦伯,似乎要证明某个观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出于某种原因韦伯突然打了涂尔干的脸。他的鼻子马上鲜血直流,他想用一方大手帕去堵。与此同时,布拉克内尔夫人晕了过去,大家赶忙上前帮她。她苏醒后不久,弗洛伊德去为她检查。接下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她的钻石不见了。警察搜查了每一个人,还在饭店里四处查看,但没有找到。事发不久,大家就散开了。我们被告知呆在饭店里,第二天早上要接受讯问。我所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些。”

“您认为谁会偷走这颗宝石?”福尔摩斯问,“它相当贵重,价值不菲。”

“我相信,你们会设法嫁祸于工人阶级的一员,厨师、侍者,诸如此类的人。你们会认为,晚宴上的著名学者们决不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可实际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可能拿走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并找个稳妥之处藏起

来。人们总是把全部罪行推诿到工人阶级头上，而奴役他们的资产阶级却在没完没了地大讲道德和正义之类玄而又玄的东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恰恰是上层人士和上层阶级才是真正的罪犯，只不过他们的犯罪活动是在大规模进行，因此他们被尊崇为英雄和政治家。那些偷了几个先令的人遭到逮捕被关进了监狱，而那些从穷人身上窃取数百万资财的人却被视作伟人。真是一场大闹剧！”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说。他取出一支香烟，然后点燃。“考虑到您的信仰，我想弄清楚您将在会上做些什么，因为您对我们英国见到的这类社会学家和资产阶级社会所持的看法如此激烈。”

“没错，”列宁说，“但我对社会进步问题非常关心。实际上，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项事业。”

“我读过您的《怎么办？》，”福尔摩斯说，“我感到相当鼓舞人心。我相信您应邀前来主要是为了处理政治事宜，因为专题讨论小组成员和发言人都要考虑社会进步问题。”

“对，”列宁说，“正是如此。我同悉尼和比阿特丽斯交往多年，事实上我还把他俩的著作《工业民主》译成了俄文。这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最近就住在巴黎，因此来伦敦参加会议并和韦布夫妇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不方便。碰巧也是在伦敦，马克思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这座城市对于我和我的运动中的其他人意味深长。”

“要知道,我还是一名年轻医生的时候,曾给马克思治过小病。我碰巧见到了两位重要的共产主义思想家。真是惊人的巧合。”

“对,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列宁说,“我担心与会的其他发言人不会欣赏我的一些观点。例如,昨天晚宴上我注意到出席者中唯独比阿特丽斯·韦布和我曾写过大量政治论著。我最近出版了一部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我的政治观作了解释。宴会上的其他人都是社会学家,而我认为社会学是小资产阶级的研究领域。要是社会不得不等着马克斯·韦伯这种把时间用来调查官僚制及其他无足轻重之事的现状维护者来改良,试问社会还要不要进步?”

“马克思的哲学首先是革命的哲学。它认为,阶级差别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工人、无产阶级这些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们将无法摆脱工资的奴役和统治,要是他们不得不等待社会学家来记录他们不断下降的生活,或者等待狡诈诡辩的资产阶级政客或工会领导人的话。”

“马克思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我在书名中用了‘唯物主义’一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它认为，正是一个国家现存的经济关系造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总特征。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恰恰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

“马克思的理论正好和韦伯的理论相反，”福尔摩斯说，“韦伯不久前论述他的理论时似乎相信，要是我正确理解他的观点的话，应该是思想决定社会。”

列宁微微一笑。

“您把韦伯看作马克思的对立面没错，”他说。“韦伯是一个想入非非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他在论述他的理论时我要是在场的话，我就会问他思想从何而来。是什么产生了思想？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积极的人是观念和思想的生产者，同时他们又受制于其现有生产力的发展……重要的是，生产力或经济力量也就是基础决定了人的意识即上层建筑。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基础即适应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反映。

“它们是以控制着报纸和其他思想传播手段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为基础的。因此上，马克思认为在每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统治思想，也就是说，社会中支配物质力量的阶级往往同时支配着智识力量。统治阶级想让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对自身的现状和发展前途抱着错误的意识……这样，他们就不会武装起义，不会驱逐那些

折磨他们的人。

“通过起义，他们会摆脱吞噬自己的异化。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工作是外在的，并非本性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他在工作中不能实现自我而是在否定自我，只有痛苦感而无安乐感。工作并非自愿，而是强迫的劳动；并非需求的满足，只是满足其他需求的手段。基本需求就是要有一份薪水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被打倒了。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琢磨着在另一人身上制造一个新需求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人人都打算在他人那里安置一种异己的力量以便满足利己的需求。”

“您描绘了一幅多么阴森冷酷的图景，”我说，“想想我自己的生活，我并没有您所说的那些感受。我的生活相当舒适，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和发展前途十分满意。”

“当然如此，华生博士。”列宁说道。

我看到他开始活跃起来。眼睛因激动而闪闪发光。

“因为您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尽管您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您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的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您的安乐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我说的是工人阶级的许多成员或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他们长时间地辛苦劳作仅换得聊以为生的薪水。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并不想侮辱您，但是您的安乐和舒适感是同您的阶级和职业相关联的。长时间地为微薄的工资而劳作，

不知您的感受是否依旧。”

就在此时，福尔摩斯加入了谈话。

“请告诉我，”福尔摩斯说，“要是阶级决定意识的话，为什么出身富贵阶级的人会成为革命者？韦布夫妇为何没有充当资本家的辩护士？您为何也没有？而工人阶级的有些成员又为何如此保守？”

“您问对了。”列宁说。

“让我先来回答您的后一个问题。请记住，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是大众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成员对自身及其发展前途抱有幻想是正常的事，因此这些人接受统治阶级的观点也在预料之中。

“要回答您的前一个问题比较困难。我认为，由于经历、个性或某些历史的偶然因素，总有一些人没有完全接受统治阶级的教导。他们成为革命的先锋，并且发现不仅要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还要与蜕化变质并接受统治阶级思想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

“那么，试问，”福尔摩斯说，“您对社会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是什么？您把自己看作该理论真正的代言人还是认为您以某种方式补充了它？我读过马克思的书，感到颇为发人深省。人们不由得会对他为工人阶级的深重苦难所发出的愤慨抱有同感，而我总是想知道路在何方。您说过社会学家及其理论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么马克思呢？他有影响吗？”

“您肯定记得，福尔摩斯先生，马克思去世还不到三

十年。”列宁应道，两眼炯炯有神。“那些年，他的思想影响巨大。在我们的运动中有一些人即孟什维克认为，俄国将逐步进入某种社会民主制度，因此没有革命的必要。我加盟的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正好相反。考虑到在俄国出现的史无前例的情况，我们相信革命不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在英国或德国这样的工业化社会里，而是会发生在俄国这样不太发达的农业社会里。当然，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能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布尔什维克相信，要是出现某种促使变化的严重危机的话，封建社会也能够产生社会主义。这个观点也许是迄今为止我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

“为了取得成功，共产党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一个集权的结构。革命需要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并且用暴力来充当武器。我们相信，目的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要是我们需要用暴力来缔造一个社会，大众在这个社会中将会避免他们所遭受的剥削，那就去干吧。

“直到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还能够通过向不太发达的殖民地输出自己的问题来阻止社会主义的胜利。依靠从落后民族身上剥削来的巨额利润，他们得以在国内支付较高的薪金，并且通过收买工人阶级来延缓革命。然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只能导致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助长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各尽所能、按需

分配。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任务，我们共产党不过是来协助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自身只能形成一种工会意识。他们能够实现在工会中团结起来与雇主斗争并促使政府通过必要的劳动法的目标，但他们自身不能形成一种革命的思想。他们需要共产党中的知识分子来引导他们走向革命和自由。

“在短时期内，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引导一个新工人国家的产生。在这个新国家，一切财产都归工人所有。阶级差别会随之消除并导致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是对阶级冲突的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会限制剥削阶级并阻止反革命，因此必须组织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专政是必需的，因为无产阶级遭受了多年苦难之后并非全部都具有阶级意识。这个新的民主国家会对劳动和消费实行最严格的控制，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暴力，产生一种比资产阶级社会腐朽的议会制度更高的民主形式。”

“您对自己观点的阐述雄辩有力、慷慨激昂，但许多方面令人不安，”福尔摩斯说，“也许由于要调查案子，我没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社会思想研究者，我不禁被您那个似乎是逻辑上的矛盾所困扰，就是您所谓的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建立专政的想法。马克思认为，国家会消失。我对您所谓的专政能否消失并自愿放弃政权表示怀疑。我这么说是基于我对人性的了解和我读过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

“然而，您必须认识到，福尔摩斯，”列宁说，“科学上的公正既不可能亦不可取。社会哲学是党派运用思想来进行斗争的手段。我们认为应该在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身上看到的所谓的科学公正只不过是个假面，是用来掩盖其受资产阶级社会的雇佣来维护现状的身份的。这些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其任务是给无产阶级施加幻象。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则不同……它代表着未来，并同共产主义必然的胜利相联系。

“这便是我要在会上所讲的社会进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仅仅在谈论社会进步，我们这些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人想要用行动来促成社会进步。”

“我希望您关于促成真正的社会进步的说法是正确的，”福尔摩斯说，“顺便提一下……您是否有可能拿了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用以资助您的运动？这是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具体步骤？”

列宁笑了：“没有，我可没拿钻石。要是我能拿的话，我很可能这么干。要知道，我不认为把富婆的大钻石据为己有是偷窃行为。我把它归为阶级斗争的一个事件，即便富人不愿意，这场战争也能使富人最终为穷人做点有用的事。

“我对我的思想坚信不移，”他接着说，“也坚信有朝一日我的运动将获得胜利。我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一天是另一回事。”列宁又道：“要是你们没有别的问题，我想去散一会儿步。我还要准备大会发言稿。”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我为您如此合作……告诉我们您在晚会上的所见所闻表示感谢。”

他走后，福尔摩斯转身看着我。

“你怎么看待列宁？”他问。

我应道：“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有些不切实际，可他自己却认为绝对正确。”

“对，华生，你说得对。”福尔摩斯说，“韦伯也可能会这么说。我看，列宁这个人聪明绝顶、意志顽强，可能会举世闻名。要是如他设想的那样，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俄国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我肯定不愿受他支配。”

在所有受压迫的人中，获得自由的奴隶徘徊于敌我之间。他脱身于奴隶制——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奴隶制，不是让生活无法忍受的奴隶制，而是不时有些许仁慈、忠诚和幸福感的奴隶制——但就人类的愿望和美德而言，依然是把黑人和牲畜归为一类的奴隶制。黑人非常清楚，无论南方人内心深处的信念是什么，他们都要竭尽全力保持奴隶制，黑人在该制度下带着半明半暗的意识受苦和战栗。他们高喊着迎来了自由。他们避开了还在为枷锁奋争的主人，奔向解放他们的朋友那里，即使那些朋友就要把他们用作迫使桀骜不驯的南方归顺的大棒。白人的南方和黑人的南方之间的裂痕在加剧。遑论本不该如此，此事不可避免，结果可叹可哀。奇怪的是，不协调因素相互对峙——北方、政府、投机家和奴隶是这一方，另一方则是白人的南方，不管是绅士还是流浪汉、老实人还是流氓无赖、无法无天的杀人犯还是尽职尽责的殉道者。

——W.E.B.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

第十章

我们访谈的下一位是……



我们访谈的下一位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思想家和律师 W.E.B. 杜波依斯。他长相英俊，在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他的一些情况。他举止庄重，看上去 40 岁左右。福尔摩斯把自己和我向他作了介绍后，他坐了下来。

“我想，您出席了昨天的晚宴？”福尔摩斯开口说。

“对，我出席了，”杜波依斯以美国式的直率答道，“昨晚好极了，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在场。赴宴者都是对社

会理论的发展做出巨大成就的人……可惜，马克斯·韦伯与涂尔干之间的争吵和珠宝失窃过早地结束了这场晚宴。”

“您都看到了什么？”福尔摩斯问。

“我没看到什么，”杜波依斯说，“我正在和格奥尔格·齐美尔进行热烈的讨论，突然听到喊叫声，我转过头想看个究竟，只见韦伯好像打了可怜的埃米尔·涂尔干。涂尔干正拿手帕捂着不断流血的鼻子。他看上去心慌意乱。布拉克内尔夫人晕倒的时候引起一阵骚乱。她恢复知觉后不久，发现首饰不见了。后来警察进来搜查了每一个人——我觉得这很不光彩，尽管我理解为何要这么做。我不明白赴宴的客人中谁会偷走她的钻石。我们找到了链子，但是显然有人从链子上扯走了钻石并藏在了饭店的某个地方。可警察没能找到钻石。我感到这是一个极不平静的夜晚，福尔摩斯先生，极不平静。我希望涂尔干教授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但愿如此，”福尔摩斯应道，“我听说，晚宴不欢而散之后，他出去散步，一夜未归。警察对他的去向十分关心，可我并不着急。”

“但愿您的想法没错。”杜波依斯说，“涂尔干不仅是个很有能力的社会学家，也是个非常好的人。他是法国社会学之父，是个影响巨大的思想家。我认为，他的著作相当重要，我们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

“是吗？”福尔摩斯问，“能请您详谈一下这些共同的

兴趣吗？”

“非常乐意，先生，”杜波依斯说，“我们都对社会进步问题以及什么是进步的主要障碍感兴趣。他认为，劳动分工导致他所谓的有机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是人际纽带松弛，团体感崩溃。我的着眼点是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重大的人际分歧，即种族主义问题。

“20 世纪的重大问题是种族界限。您要记住，全世界靠着来自非洲等大陆的产品的支持而越来越发达，统治世界的却是拥有非洲的工业社会集团。我清楚地看到，未开化的人们之所以愚昧无知、贫穷落后，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机会，他们的劳动成果也被掠夺一空。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都在想方设法让这种状况合理化，声称文明国家和知识阶层是与生俱来的，而非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如今，我们开始目睹欧洲文化的衰落了。社会学家早已预见和强调了这种可能性；然而，这一可能受到了阻碍，如今也许受到了严重的阻碍，阻碍来自欧洲和有色亚洲、黑非洲之间的关系，以及不顾事实逻辑和科学教导而执意坚持让大多数人受白种人的奴役。”

“因此，您把种族而不是阶级，看作人类冲突的根本原因。”我说。

“您说得完全正确，华生博士，”他答道，“您要记住，阶级同样重要。贫穷是不必要的，显然是贪婪和混乱的产物。贫穷一度主要源于供不应求，如今源于建立在我们工业体制基础上的垄断。必须打破这种钳制。暴力和

革命不过是内在事实的外在歪曲，单靠它们是不行的，还要靠古老的基本道德即个人的审慎、坚毅、节制、公正以及后来的信、望、爱三德。”

“我们刚才同弗拉基米尔·列宁进行过讨论，”福尔摩斯说，“我看，他可不愿意等着信、望、爱来改变社会。他认为，要用暴力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尽管我认为他是一位比较重要的思想家，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全世界无产阶级不仅仅包括欧美的白人工人，其中大多数是亚洲、非洲、岛国和中南美洲的有色工人。正是他们支撑着富有和奢华的上层建筑。只有他们的崛起才能导致世界的崛起。的确，种族问题的一个阶段引发了我们国家的内战。我认为，黑奴问题是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因。”

“我得承认，我发现您的观点与列宁的很相似，只不过您鄙视暴力。不到一个小时以前，他给我们谈起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资本家何以能够向您刚才提到的民族输出问题。”

“我们之所以相似，是因为我们都认为欧洲世界之外的民族遭受了惨重的剥削，而且还在遭受剥削，”他说，“但我并不把暴力视为他们自我改善的途径。我相信自由和民主的力量可以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精神进步达到较高的水平。我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社会面临重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种族而非阶级。”

“在我个人的生活中，我忘不了孩提时就面临的种族

难题。有一天,我懵懵懂懂地意识到,我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张大幕把我和整个世界隔开。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就是我的黑色皮肤。此后,我无意去扯下帷幕,也不想匍匐而过。我对幕后的一切不屑一顾。多年以后,这种鄙视开始淡化,我所向往的世界及其耀眼的机会都是他们的,不是我的。可是,他们不应该霸占着这些头彩不放。我要从他们手里夺下一些,或者全部。只不过我还没拿定主意该怎么做。对其他黑孩子来说,情况可就没那么乐观。他们要么在趋炎附势之中耗费青春,要么默默地仇视周围的白人世界并且嘲弄和怀疑白人的一切,或者痛苦着哭喊道‘上帝何以要我在自己的家中充当弃儿和异客’来虚度光阴。

“要知道,黑人相当于第七子,在美洲生来就蒙着面纱并具有第二眼光,这个世界没有给予他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他通过另一世界的启示来观看自己。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要透过他人的眼睛来观看自我的感觉,还要以一个轻蔑而同情地悠闲旁观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灵魂。人们总能发觉他的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这是所有的美洲黑人都必须苦苦对付的问题之一。而我认为,我们是能够克服的。”

“这真是很奇特,”福尔摩斯说,“但您刚才通过讲述自己早年感人的经历所提出的问题让我不由得想到了齐美尔教授的话。”

“您很有洞察力，”杜波依斯道，“您知道，他对异客问题很感兴趣，因此我们有一些共同点。我是一个黑人，他是一个犹太人。尽管肤色不同，我们非常相似……在欧美，我们几乎总是被迫充当异客。这并非我们希望采取的态度，但我们无法避免。”

“这我能理解，”福尔摩斯说，“我想，这次有关社会进步会议的组织者会对您的思想很感兴趣。我能看出，您发自内心地相信社会进步是可能的。”

“不仅可能，福尔摩斯先生，”杜波依斯说，“而且不可避免。”

“如果您对昨晚令人惋惜的结局无话可谈了，您可以走了。”福尔摩斯说。

“谢谢您，”他答道，“我想不出谁会拿走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我不相信哪个出席盛宴的人会干这样的事，警察搜查的结果便是明证。每个人都搜过了，房间也搜过了，钻石仍然下落不明。有人想出了一个绝对巧妙的方法来藏这颗宝石。此人应该智商很高，可德行极差。”

他起身离开房间。

“真令人肃然起敬，福尔摩斯。”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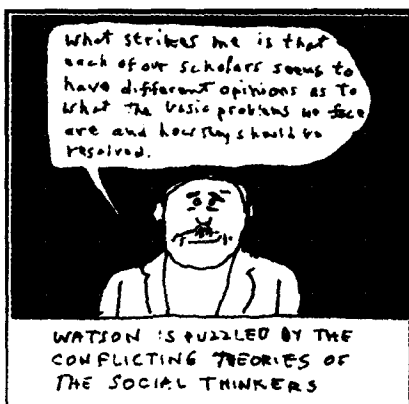
“一位勇敢的民族斗士，”福尔摩斯道，“是个品格高尚、英勇无畏的人。”

社会并非全是人们时常过于关心的那些反逻辑或非逻辑、凌乱荒谬的存在。恰恰相反,集体意识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因为它是意识的意识。由于位于个体和狭隘的偶然事件之外,集体意识只看到事物中永恒和实质性的方面,把它们结晶为可传播的思想。同时,集体意识似乎位于上方,看得更远,每时每刻都欣然接受一切已知事实,这就是它独自能给大脑提供适用于事物总体并使思考这些事物成为可能的模式之原因。

——埃米尔·涂尔干《道德教育》

第十一章

敲门声让我们吃了一惊



敲门声让我们吃了一惊。一名侍者端着大托盘走进房间。

“经理吩咐给你们送点茶和三明治。”他说着，把装有茶、三明治和小点的托盘放在桌上。

“多谢，”我说，“我吃了一顿不错的早餐，可我得说我腹中开始感到有那么一点饿了。”

我给自己倒了点茶，开始吃三明治。

“华生，”福尔摩斯说，“虽说我也能吃点东西，你的胃

口真让我吃惊。我们同社会思想家进行这些讨论在某种意义上相当费劲。”

我给他倒了些茶，把一块火腿三明治放在盘子里递给他。他吃了起来。

“我的印象是，”我应道，“每位学者似乎对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持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法国人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是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它导致了失范、团体感的崩溃以及其他困难。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背后是禁欲主义的新教，而这又反过来造就了我们的社会和价值观。他还认为，官僚制是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意味着权力从那些有魅力者的手里转移到了官僚形式中，如今又到了他所谓的理性—合法权力形式中。”

“对，”福尔摩斯说，“与我们交谈的每一位都持有不同的理论。每个理论都有道理。我们的理论家都是一些杰出的人，也会有作为人必须忍受的种种身心问题。”

“当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是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人的攻击性只有靠内疚来抑制，因此我们都像被攻陷的城池中的囚犯，靠我们自己的良心来监控。他的思想也具有社会维度。然而，弗洛伊德刚离开，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就进来说，人际互动是社会的基本因素，我们既是有自己思想的个体，又是深受来自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价值观和信仰影响的社会性动物。饭间，列宁说阶级差别是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制度是

根本,因为它产生了适应统治阶级思想的信仰、价值观和机构,这迥异于强调思想重要性的韦伯。刚才杜波依斯教授又来告诉我们,种族是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进步的基础在于解决种族问题。”

“对,你说得对,”福尔摩斯说,“当然你也曾说过,大脑结构可能至关重要,隐藏在犯罪活动和冲动行为背后的东西可能与大脑皮层有关。下一步,华生,我敢肯定我们将发现另一个理论,可以解释社会为何没有进步以及当务之急是什么。这些思想家都献身于了解人们种种行为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相互间就各自的主题展开了一次充分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们热情而投入。当你拥有这些对话者那样出类拔萃的头脑时,就可以期待趣味横生、有时发人深省的思想的出现。”

“我们只剩一个人要询问了,那就是引人注目的比阿特丽斯·波特·韦布。我一直在报纸上追踪她,她和丈夫悉尼·韦布在最近二十年的新闻中频频出现。他俩是声名显赫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革家,她就英国的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等问题写了不少著作。此外,韦布夫妇还创办了伦敦经济学院。他俩和乔治·萧伯纳、H.G.韦尔斯同属费边社的成员。她几乎认识政界的每一位知名人士。真是一个有趣的女人。”

“她年轻时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我说,“很漂亮。我得承认,她嫁给悉尼·韦布时我真是大吃一惊。真让人难以想象,她会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伴侣,但我认为他俩婚

后很幸福。他俩结婚都快满二十年了。岁月如梭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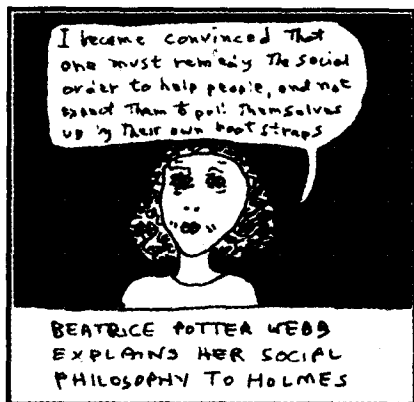
“既然我们已经用过便餐,我建议你告诉莱斯特雷德的手下,说我们想见韦布夫人。尽管她住在城里,今早也被叫来等待接见了。”

一个人贫穷并不意味着他就属于“穷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类别……只有在他们受救济的那一刻……他们才成为以贫困为特征的群体的一员。该群体并非靠成员相互作用来维持，而是由全体社会对它所持的集体态度来维系……不能把贫穷本身看作是一种量化的状况，必须依据源于特定状况的社会反应而定……贫穷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现象：为数众多的个人纯粹由于个人命运在全体中占有一个特定的有机地位，这种地位并非由命运和状况而定，而是由试图纠正该状况的其他人而定。

——格奥尔格·齐美尔《穷人》

第十二章

莱斯特雷德的手下……



莱斯特雷德的手下开门通报说：“先生们……韦布夫人到了。”话音未落，她已走进房间。她神态自若，可能与她时常演讲有关。她和丈夫悉尼认识当前所有最重要的人物。

我记得她年轻时很漂亮，在目前的场合下这想法可能有点轻浮；如今，在 50 岁头上，她已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端庄的女人了。我不知道有些漂亮女人为何总是嫁给那些至少在外貌上配不上她们的男人，我也认识到这可能

是我个人的愚见，因为我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看问题的。

“早上好，先生们。”她边说边步入房间，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她仔细看了一眼要落座的椅子，走过去坐下来，没等询问便先发话了。

“喏，”她轻快地说，“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福尔摩斯第一个搭话。

“我名叫夏洛克·福尔摩斯，”他说，“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先生是我的搭档华生博士。”

“见到您很高兴，”她面带和蔼的微笑说，“多年来，我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和钦佩之情关注您作为一名私家侦探的英勇业绩。我总在想，像您这样一个才智超群的人没有以政治为业真令人遗憾。要是那样的话，我想您准会成为首相……而且非常出色。”

“过奖了，”福尔摩斯应道，“我把政治领域留给了别人。在这项事业中，我注意到您和您丈夫做出了不少重要贡献。”

韦布夫人又笑起来，这次面露幽默的神情。

“我想您对昨天发生在玛丽安娜·韦伯举办的晚宴上的事感兴趣。”她说。

“对。”福尔摩斯鼓励她说下去。

“我说不出太多内容。我知道，玛丽安娜认为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在一起会餐是一件乐事，因此为大家安排了一次晚宴。你们肯定知道，我要在今晚举办一个晚会，但面向更多的人。我不仅邀请了主要发言人，还有许多政

界名人和我的作家朋友。

“不管怎样，昨天的晚宴一切顺利，就在快要结束时，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卷入了一场理论辩论。韦伯坚持说个体及其行动是社会学的基本原子，涂尔干则攻击这一想法过于简单化并且坚决认为社会现象是社会学的基础和真正主题。这似乎引发了一场争论，后来马克斯突然一拳打在埃米尔的脸上。

“我们全都惊呆了。可怜的埃米尔好像被脸上的这一拳打懵了。他的鼻子鲜血直流，他掏出一方手帕来止血。我们正要前去照料他，就在这时我的朋友塞西莉·布拉克内尔一声尖叫，晕过去了。就在她倒地摔伤之前，幸亏一名侍者抓住了她。我们都拥向她那里。埃米尔冲进厨房给她拿来冰块。混乱之中，似乎有人拿走了钻石，藏在餐厅或厨房的某个地方。这就是我能告诉你们的全部内容。赴宴者不会受到怀疑，那个可怜的侍者吓坏了，唯恐罪名会落在他的头上。”

“也许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再这样可怜了？”福尔摩斯嘟哝道。“请告诉我，您认为韦伯教授为何如此鲁莽行事？”

“我没有参与谈话，不知道埃米尔说了些什么会使他如此狂暴。当然，暴力是男人要解决问题时常使用的手段。”

“不幸被您言中了。”我赞同道。

“要是我告诉你们一些我的经历，你们或许就会明白

我从事政治的原因了。我是富商理查德·波特的第八个女儿。我母亲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但他在婴儿时就夭折了。因为是个女孩，我受到的正规教育比较少，因此我不得不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自学。我读了很多书，对科学和哲学兴趣很浓。我母亲认为我是家中唯一没有天赋的孩子。我母亲去世时我还年幼，就留在家中协助照顾父亲。他是著名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朋友，我同他见过面，这非常重要。

“我成年后爱上了约瑟夫·张伯伦，但我们两人的个性差异太大，于是终止了关系，真是痛不堪言，唉！后来我对慈善事业发生了兴趣。我父亲去世后留给我每年一千英镑的遗产，这帮助我完成了一部有关英国合作社运动的研究著作。我开始相信人们必须矫正政治秩序来帮助穷人，不能指望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这是社会结构而非个人的问题。对极度贫穷的伦敦东区的调查研究使我认识到这一点。在此期间，有人介绍我认识了费边社的成员悉尼·韦布。几年后，就是在 1892 年，我们结了婚，婚后我俩很幸福，一起不知疲倦地为改善社会而工作。”

“我认为，”我说，“您对自己作家和演说家的角色感到很自如。我看公众非常需要您。”

“其实，华生博士，我初次对听众讲话时简直呆若木鸡。每当我走进坐满人的房间而怯场时，我总对自己说，‘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中最聪明的阶级中最聪明

的家庭之一中最聪明的成员，你怕什么呢？’这给了我很大安慰。如今，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已经游刃有余，尤其是关于妇女问题。你们一定知道，近年来我已成为英国妇女运动的一部分了。”

“对，”福尔摩斯说，“我获悉，您曾长期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

“没错，”她承认道，“早年，我曾一度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但我又改变了想法。我之所以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不相信一切所谓的名义上的权利的有效性，不论是选举权还是财产权。我把生活看作一系列的义务——个体对集体的义务和集体对个体的义务。我不认为妇女作为女性有任何参与政府管理的义务。我想，妇女会甘愿把粗俗杂乱的政治交给男人，从而集中所有的精力去完成在我看来似乎是她们特有的社会职责——生儿育女，促进学术，把对精神生活的推崇代代相传。”

“是什么让您改变了主意？”我问。我觉得比阿特丽斯·韦布是个令人钦佩的人，气度不凡、信心十足、头脑敏锐。然而，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我更赞成她早年的观点。

“我所指的劳动分工只有在男人和女人相信政府充当他们共同代理人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我原先所认为的妇女关心的要务很快就成了整个集体所关心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妇女必须通过在那些方面共同掌管国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唉，通过不断干扰公众集会和其他扰乱

治安等违反宪法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信仰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由于没有符合宪法的方式来维护我们的观点,我们被迫采取这样的行动。这就是我认为必须给予无论已婚还是单身、有产还是靠工资为生的妇女以选举权的原因。这是我们获得公正待遇、保护自身权利的唯一途径。”

“因此您认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女人的干扰行动在道义上是可取的。”福尔摩斯说。

“我的的确确这样想,”她坚定地说,“我已致力于为工人阶级获取公正的待遇,我认为妇女的待遇也不公正,因为我们没有求助于传统的政治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扰乱日常活动,让人们关注我们的运动并最终获得选举权。”

“我要说,我在这一点上同意您的看法,”福尔摩斯插话道,“如果英国要有真正的民主,只有给予妇女选举权才行。”

我得承认,福尔摩斯的激进观点让我感到有些诧异。当然,在我俩长期的友谊中,也没有多少机会谈论政治或社会哲学,因为我们总在一门心思地与罪犯斗智斗勇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说到我和女权的关系,让我给你们讲一则逸闻趣事。”韦布夫人在讲故事时活跃起来,“有个男人曾对我说:‘我认为关于女权主义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女人要紧的是美而不是才。’我答道:‘完全正确,那是因为蠢汉

太多，瞎子太少。’”

我觉得韦布夫人的故事十分有趣，福尔摩斯也有同感，他放声大笑，这是多年来我所见过的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还有一件事。昨晚您和涂尔干教授谈过话，他是否提到他在伦敦有什么可以给他安慰或让他留宿的朋友？”

“没有，”她答道，“他没提过。他告诉我说他已来过伦敦多次了，但没说过有什么可以求助的朋友。出什么事了？”

“呵，”福尔摩斯说，“他昨晚不见了，但我并不很担心。”

“这我就放心了，”她说，“你们已经见过全部主要发言人，同时积极参与了涂尔干教授失踪事件，我想邀请你俩参加我今天举办的晚会。我希望你们能大驾光临，能想办法和涂尔干一起来。”

“我们当然愿意，”福尔摩斯肯定地说，“感谢您的盛情邀请。能在如此宽松的气氛中见到那些和我们会谈过的学者真是一件乐事。”

“太好了。”她爽快地说。

说罢，比阿特丽斯·韦布起身离开房间。

“我真不想同这个女人辩论，”福尔摩斯说，“她绝顶聪明，难以驳倒。她是妇女运动伟大的捍卫者。我想，再同韦伯的妻子谈话不会有什么用了，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同昨天赴宴的每一个人谈过了。情况就是这样，华生，我们去看看那位教授是否回来取走了房间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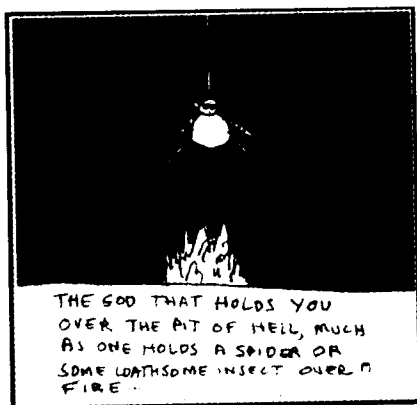
但是一个神并不仅仅是一种我们所依附的权威，它也是一种我们的力量所依靠的力量。人服从于他的神，并由于这个原因相信自己拥有它，感觉自己的力量增加了，能充满信心地接近世界。同样，社会行动并不只限于要求我们做出牺牲、忍受困苦和付出努力。因为集体的力量不完全外在于我们，并非完全从外部驱使我们。社会既然只能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个人的意识存在，这种力量就会完全进入我们之中，在我们之中形成。这样，它就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因此得以升华和彰显。

在被共同的激情所鼓舞的集会中，我们易受那些单靠自己的力量所不能接受的行为和感情的感染。集会解散后，重新面对自己时，我们就又降回到平日的水平，那时我们就能衡量出刚才被抬升到自己水平之上的高度。

——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

第十三章

我们离开询问赴宴者的房间



我们离开询问赴宴者的房间，向饭店前台走去。

“顺便问一下，涂尔干教授回来了吗？”福尔摩斯问道。

接待员看了看外出者的钥匙，告诉我们他的钥匙还在，人还没有回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福尔摩斯说，这在我听来有些神秘，我转身想问他为何一整天总是话里有话。

就在此时，看上去精疲力竭的埃米尔·涂尔干走进克

拉里奇饭店大厅。

“福尔摩斯先生，华生博士，”他向我们招呼，“我度过了一个极不平常的夜晚，收集到了相当惊人的资料。我早就期望调查宗教对伦敦穷人生活的作用，可万万没想到竟有如此大的收获，尽管为此身体有些不适。”

“很高兴见到您，涂尔干教授，”福尔摩斯镇定自若地说，“不少人在为您担心。请原谅，我要给苏格兰场捎个口信。只消一会儿工夫。”

我极力掩藏着对教授的归来和福尔摩斯冷淡反应的诧异。

福尔摩斯从涂尔干旁边擦身而过，绊了一下，一把抓住教授的袖子。我为老朋友的健康担心起来。我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去抓那么脏兮兮的夹克。福尔摩斯很快恢复了平衡，继续向近处的一名警察走去。他传完口信后，警察迅速离去，福尔摩斯回到我和涂尔干教授站着的地方。

“莱斯特雷德马上到，”福尔摩斯一边低声告诉我，一边不停地摆弄着自己夹克口袋里的手帕。

“我很想听听您昨晚的奇遇，”福尔摩斯说。“或许您要先回房间梳洗一下。我和华生在休息室里等您。”

“好，我去好好洗一下，再换件干净的衬衣。然后，我愿意和你们在一起，给你们讲讲我的伦敦奇遇。”说完，他取来钥匙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我和福尔摩斯到休息室要了一杯白兰地。列宁和杜波依斯正在我们旁边的一张桌子上讨论着问题。

“难道您没有意识到，”杜波依斯边说边打着美国式的手势，“您的革命和您想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导致……肯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暴政？国家就不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消亡。”

“要是我们坐等民主途径，”列宁辩道，“我们就不会有公正而自由的社会。由于受资产阶级的控制和操纵达几十年之久，无产阶级自然缺乏民主精神，如果没有暴力革命、没有献身于人民的领导集团，就不会有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除此别无他法。”

他们辩论了很久，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方法正确，极力想说服对方改弦更张。

涂尔干太需要洗个澡了，浴后，他精神焕发地回来给我们讲述他的奇遇。

“先生们，你们别忘了，”他说，“我是一个学者，我的生命多半是在大学教书、做研究、做实验、在图书馆查书、尤其是在写作中度过的。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书房中著书立说。我根本没有机会如我所愿同工人阶级在一起，同那些通常认为属于巴黎下层社会而伦敦绝对没有的人们在一起。”

“您所描述的教授生活似乎相当封闭狭隘，几近与世隔绝。”福尔摩斯说。我想到了我们不断穿梭于伦敦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经历。

“对……对，的确如此，”涂尔干应道，“很奇怪的归隐遁世的生活。我写了不少有关宗教的东西。实际上，我

未来的主要著作之一《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就是该主题的专论。我得补充一下，我原先从未想到我和我大多数同事的生活竟如此刻板狭隘。如今我才意识到，我之于社会理论，正如教徒之于神学；我酷爱阐释今世人与同类之间的关系，正如教徒热衷于尽其所能地阐释来世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您对此作何解释？”我问道，“我得承认，我对学者的生活知之甚少，教授们为工作所累竟然对生活如此无知，何至于此？你们这些向他人阐释社会生活的人竟然没有自己的社会生活可言，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社会学理论有某种令人着迷的东西。”涂尔干答道。他边说边拍自己的各个衣袋，像是在找烟盒。他抓衣袋时，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色。然而，整个过程中他的声调始终很平稳。

“它控制着你、诱惑着你，因为你感到你的思想而且仅仅是你的思想本身就足以解释人际关系。你让自己相信你没有误解别人，因此你付出一生去发展你的理论，同时抨击那些与你相左的理论。抽象思想有某种东西令人陶醉，这便是为何有如此之多的哲学家、神学家……当然，还有社会学家。”

“我认为，昨晚对您有些影响。”福尔摩斯说，把他拉回眼下的话题。

“的确如此，”涂尔干热情地说，“因为我和工人阶级混在了一起，能够直接看到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或者更

确切地说，一些人在伦敦是如何生活的。我认为他们与英国其他城市的人没有多大差别。我说过，为了弄清我们是否偷了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警察搜查了我们，晚宴不欢而散。我苦于鼻子流血不止，想用一方大手帕堵住。我担心脸会肿，还从厨房弄到一块冰，用一位好心的厨师给的毛巾包着来消肿。我离开了饭店。然而，更糟糕的是，我有点晕晕乎乎的，于是在饭店外面徘徊，想呼吸一点有益的新鲜空气。我原打算研究一下宗教对伦敦穷人生活的作用，于是决定当晚就干。我发觉自己正在伦敦城里游荡。没过多久，我发现迷路了，根本不知道身处何地。眼前的街道比我以往在伦敦见过的要破旧得多。雾气更加污浊，男男女女都是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尽管身上的东西并没有那么重。我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伦敦城穷人的居住区。

“街上很拥挤，不少人从我旁边挤过去，有些人好像喝醉了。”

“我想起喝点什么可能会使我平静下来，有助于我集中精神。正好看到一家酒馆，于是我走进去。屋里满是小层社会的人。我到一条长凳前坐下来。”

“‘您想来点什么？’女招待问道。”

“‘一杯白兰地，谢谢。’我说。”

“‘好的。’她说。她倒了一杯白兰地递给我。”

“‘您的脸色不太好，’她说，‘没事吧？要我帮忙吗？’”

“‘出了点小小的意外，’我说，‘没事儿。’”

“‘您是个外国人，’她说，‘最好别在这儿待太久。这儿的常客不喜欢外国人，很不喜欢上等人。从您的穿着上看得出您是个绅士。您要是知道好歹的话，就不该到这种地方来。’

“‘谢谢您，谢谢您。’我边说边付了款。

“‘既然来了，我就要关照您，确保您不受伤害。’她又说。

“尽管要让这样一个女人来保护有些奇怪，我还是心存感念。我很快喝完白兰地，离开了酒馆。我正往前走，两个流氓上来跟我搭讪。其中一个人到我面前拔出一把刀子，告诉我他想要我的钱包，我要是不反抗也不大喊大叫的话就毫发无损。我把钱包给了他，两个人便消失在黑咕隆咚的小巷里。

“我在一个街角偶然看到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屋子。屋里的人形形色色，多半都衣着简陋，在唱赞美诗。我从门前走过时，有个身穿制服的女人——我想是碰到了救世军的集会——看到我踉踉跄跄的，便过来帮我。

“‘进来歇一会儿吧，可怜人。’她对我说。

“她把我领进屋，让我坐在后面的一把椅子上。屋子很大，两堵墙之间摆满了长桌子，只在前后两端留出狭窄的通道。屋里的人唱完后坐下来。屋子前端有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应该是穿制服女人的同事，一脸严肃地开始对会众讲话：

你们都是罪人，他说，你们要是不改过自新并把自己交给上帝的话，你们要是不戒酒并抛弃放荡的生活的话，你们会全部毁灭，并在地狱中煎熬一百万年。上帝的愤怒之弓已满，箭在弦上，正义的利箭对准了你们的心房，弓拉开了，仅仅是上帝的意愿，愤怒的上帝的意愿，无需任何承诺或义务，才使利箭暂时没有浸透你们的鲜血。上帝对你们深恶痛绝、怒不可遏，他抓着你们放在地狱之上，就像人们拎着蜘蛛或虫豸放在火上一样。他对你们的愤怒如烈火般在燃烧。他视你们如无物，只配扔进烈火之中。在他看来，眼不见为净。你们在他眼中万分可憎，就像最恶心的毒蛇在我们眼中一样。啊，罪人们……想想你们所身处的险境吧。这是一座愤怒的熔炉，是一座无边无底燃烧着愤怒之火的地狱，你们都掌握在上帝手中，他对你们的满腔愤怒就像对那些打入地狱的灵魂一样。你们命悬一线，上帝的怒火在周遭燃烧，随时都会线焚人亡。

“说到此，在座的人无不痛苦哀号。我觉得要被泪河冲走了。我分明看到，穿制服的女人所谓的这些可怜人都是头脑简单的草民。‘救救我，救救我，’有个男人喊道，‘从今以后，我把自己交给你。再也不喝了，主啊，再也不嫖了……’有不少人都如此这般地叫喊着。哭喊声、诉求声、祷告声响成一片。有些人戴着礼帽，其他人戴着

布帽。每个人都衣冠不整、衣着简陋，从他们的站姿上，我看到不少人因酗酒而东摇西晃。人行道上领我到集会里来的女人认为我跟屋里的那些人一样，也是一个醉汉。

“与此同时，讲话者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历数无穷无尽的苦难正等着那些不改过自新并把自己交给主的可怜人。

“‘您要留下来吃饭吗？’她问道。

“‘啊，谢谢您。’我说，不知怎的，我饿极了。‘我遭抢了，’我说，‘没钱给您。我在饭店有个房间，可是没法回去。’

“‘您不需要付钱，’好心的女人安慰我，‘您可以和我们呆一夜。明早，我们会供给您早餐，然后把您送回饭店。您需要治疗吗？您病了吗？’她问道。

“‘没有，没有，谢谢您，’我说。‘我出了点意外，弄伤了鼻子。我有点头晕……但没喝醉。您尽管放心。’

“后来，她把我领到一间寝室，我在那里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得较晚，教会招待所的人让我吃了早餐后，派人把我送回了饭店。”

“真奇特，”我说，“我读过一些有关救世军集会的描述，可从未参加过。那人们在火光熊熊的地狱之上命悬一线的形象……太绝妙了。”自从我和福尔摩斯分开住以后，我自己的冒险经历就少了。”

“对，真绝妙，”涂尔干说，“我在研究宗教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在我参加的这类集会中行为超常，宗教领袖在这

样的集会中激发人们情绪的能力也是惊人的。类似于祷告会这样的活动得时常举行,以便巩固所激起的情绪,若不时时强化,便会逐渐减退。尤为可贵的是,我从调查研究中深刻地了解到我们需要在集会中同其他与我们有共性的人在一起,了解到集体的力量……尤其是宗教性的集体。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想我们的不少社会性都与这样或那样的宗教组织相连,这有助于我们减轻孤独感,去对抗失范和异化的倾向。”

“这好像合情合理。”我应道。

“失窃的宝石怎么样了?见分晓吗?”涂尔干问道。问题提得似乎有点正儿八经。

“快了,”福尔摩斯说,“就在今夜的晚会上,我将揭开布拉克内尔夫人的宝石藏匿之谜。您也许会帮我。”

“我愿尽力而为。”涂尔干满面忧虑地应道。

“好,”福尔摩斯神秘地说,“我相信您会的。”

由于首饰一般也是一件贵重物品，因此是个人的财富和存在的综合：能把简单的占有转化为人自身的舒适而鲜明的可感知性。普通的衣着则不然，既不能在财富方面也不能在存在方面作为个人的特殊性给人留下印象。只有奇装异服，尤其是珠宝首饰，似乎才能把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或光辉凝聚于一点，把纯粹的个人财富变成他存在的可见的品质。虽说首饰是“多余”之物，却恰恰因此而有珍贵。

——格奥尔格·齐美尔《首饰》

第十四章

比阿特丽斯·韦布在克拉里奇饭店 举办的晚会



比阿特丽斯·韦布在克拉里奇饭店举办的晚会刚刚开始。侍者把香槟酒分送给各位来宾，同时小心翼翼地躲开在室内各处留守的警察。我和福尔摩斯、韦布夫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布拉克内尔夫人在一起。

“我感到此次会议对女权不利，”比阿特丽斯·韦布说，“从名单上来看，大多数发言人都是男性。唉，女性代表极少。我肩负着要让那些对社会进步感兴趣者去考虑

所有国家、所有阶层的女性需求的重任。不论是在英国这样先进的国度，还是在较为落后的国家，女性普遍遭受剥削和不公正的待遇。每当我想起自己看待女性与政权问题的态度曾经有多么愚蠢时，我就会认识到要让普天下男女众生认识该问题的重要性有多么困难。”

弗洛伊德微微一笑，低声对我说：“女人想要什么？”考虑到眼下微妙的局面，他不想让韦布夫人听见他的话。

“女士们，先生们，”福尔摩斯发话道，他用一把餐刀敲打着酒杯以引起众人的注意，“我受苏格兰场的莱斯特雷德警官之托来调查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失踪案。此时此刻，我来揭开这个谜底。”

谈话声中断了，满怀期待的社会学家们都转身面向福尔摩斯。涂尔干好像是唯一对福尔摩斯的揭秘不抱希望的人。

福尔摩斯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个用他的手帕包着的物件。他打开手帕，灯光下在他的手中闪闪发光的正是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我的惊讶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人。我整日都和福尔摩斯在一起，他究竟是何时找到钻石的？

“太感谢您了，福尔摩斯先生，”布拉克内尔夫人气喘吁吁地说，“钻石究竟在哪……哪里，您是怎么找到的？”

福尔摩斯宽厚地笑了。

“其实，这很简单。要了解事情的原委，我得告诉你们两天前发生的事情。涂尔干教授曾经出于对韦伯教授的忧虑拜访过我。涂尔干教授好像担心韦伯教授有对他

人或自己贸然行事的危险。当时，他还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在他发话之前不要拆开。

“在不拆信的情况下，我仔细检查了一番。通过手感，我识别出这不是一叠文件，而是一张纸质不错的信笺。为了透过信封察看里面，我一边同涂尔干说着话一边把信对着台灯，就连华生你这位知己也以为这不过是我漫不经心的表现而已。

“可是，涂尔干完全可以以后差人把信送来，为何要叮嘱我别拆信呢？涂尔干失踪后，我明白了他的意图，他的失踪就是让我拆信的信号。我在等华生到来的时候拆开了信。

“信中写的是他所设想的一个实验，以此观察不同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对他策划的挑衅事件的反应有何不同。我来读一下信的全文。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可以说，我有意要与即将出席伦敦有关社会进步会议的同仁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我打算与一位发言人展开争论并迫使其他发言人做出回应。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仁就社会学所关心的理论问题著述颇丰，但我想知道他们对于自己著述中的不少论题在实际生活中是否有相当的经验。我担心并怀疑他们的工作是否像我的一样大都是些书面文章。可以说，我有意要纠正社会学中这种不谙世事的状况，促

使我的同仁确认他们的理论立场是如何影响他们对所发生之事做出回应的。

希望这个小小的实验不会让任何一位发言人过于苦恼,我要事先对我可能给任何人造成的焦虑或不安表示歉意。但愿我能让他们从构筑理论的玄而又玄的抽象概念中走出来,迫使他们亲眼看看自己对身边所发生之事是如何反应的……让他们从云山雾罩的理论中回到真实的人间,哪怕只有一小会儿也好。

埃米尔·涂尔干

“我认为他早就想好要同韦伯教授或齐美尔教授甚或是弗洛伊德大夫就社会学所关注的某个问题发起争论。涂尔干想知道每个人会如何反应。”

福尔摩斯转向正在瑟瑟发抖的涂尔干。

“您是否料到韦伯会动拳头、布拉克内尔夫人会晕倒而她的钻石会从链子上滑落呢?”

涂尔干一脸窘迫。福尔摩斯向我们大家解释说:“读罢此信,我来到克拉里奇饭店与诸位面谈。我了解你们之中有多少人已知这是涂尔干的一个实验。要是有人知道的话,他就有充分的理由窃取钻石以推进实验。同所有人谈过话并仔细检查了饭店后,涂尔干拿走钻石这一事实就再清楚不过了。钻石当时滚向涂尔干,他于是捡起钻石离开房间,声称他去找点帮布拉克内尔夫人苏

醒的东西。他看到了僻静的冰室，于是铲下一些冰来，把宝石放在冰块里，然后包了一块冰带给布拉克内尔夫人。

“他的实验在继续，从一个普通的挑衅行为升级为真正的犯罪，尽管是不同寻常的犯罪行为。他似乎忍不住要扩展他的实验，看看你们这些同仁是如何反应的。然而，他并没有在克拉里奇饭店观察所发生的一切。请注意，以科学为名义的这一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学家可以在自己的实验中做些什么。

“盘问过所有的人，搜遍整个现场。警察也没有看到放在冰块中的透明钻石。涂尔干教授拿了一些冰来消肿，把钻石放在冰块下面，径直走出了房间，准备调查伦敦的宗教和下层社会。就在调查福音派的过程中，他遭到抢劫，两个流氓劫走了他的钱包，掏空后扔进了泰晤士河边的水沟里。这让莱斯特雷德警官怀疑他已被谋杀，于是派人在河里寻找他的尸体。结果，涂尔干教授却在伦敦一个福音派所属的招待所里过了一夜。

“今天下午，涂尔干教授回到了饭店，我掏了他的包，找到了钻石。他显然感到他的实验和调查比原先设想的还要成功。我相信，你们之中不少人不会有同感。”

“涂尔干教授，”布拉克内尔夫人高声说，“你使我遭受如此的苦痛真让我感到震惊。我哭了整整一夜，担心再也见不到我已故丈夫送给我的这块钻石了。这是自我丈夫去世以后，我度过的最糟糕的一夜。”

“你挑起同韦伯教授的争论已经够糟糕的了，”比阿

特丽斯·韦布接过话头说，“又让布拉克内尔夫人遭受如此的苦痛，而她为减少贫困问题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仅仅是由于你有心要拿我们做实验，简直太过分了。先生，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人因你拙劣的实验而备受折磨。”韦布夫人手按着布拉克内尔夫人的肩膀，怒视着涂尔干。

格奥尔格·齐美尔加入了这场激烈的演说：“照你所说的‘要给我们提供实际生活的经验来抵消我们的理论癖好’来看，我可以理解你想研究我们的欲望。你知道，我对人际互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你无权以科学为名义让人们遭受惨痛的经历。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无益的。”

“说得对，”杜波依斯说，“我作为一个有过更痛苦的生活经验的人在此说话。涂尔干教授，我们种族的人懂得真正的生活。我们懂得由于自己的肤色饱受排斥和屈辱的滋味。并非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是书面研究的俘虏，先生。”

“我只能说，”玛丽安娜·韦伯说，“你对待我的丈夫和可怜的布拉克内尔夫人的方式让我感到震惊。就他目前的身体状况而言，引他卷入一场争论可谓麻木不仁，全然为了一次实验而拿走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不仅非法而且可耻。你的行为让我感到愤怒。”

涂尔干面对同仁们的抨击羞愧难当，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举在面前，犹如一面小小的科学盾牌。

马克斯·韦伯快步走到涂尔干面前。

“你让我遭受这番可怕的痛苦就是为了做实验？”他低声质问道，“你对人有没有起码的尊重？你以为你是一个社会学家就能够以科学为名义对别人想怎样就怎样吗？难道你对个人的权利毫无感觉？想想你让我们经受的这一切……我亲爱的妻子，可怜的布拉克内尔夫人，格奥尔格·齐美尔，我自己，每一个人！我建议你还是做你的理论工作去吧！”他一脸愤怒。

“可是，马克斯，”涂尔干辩解道，“请相信我，我为后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深表歉意。我绝对没想给您或其他人带来痛苦，但像不少实验一样，这个实验多少出了点岔子。我只是想……”

话音未落，韦伯照着他一拳打将过去——这回打在了另一边脸上。

“*Mon Dieu!*^①”涂尔干大叫一声，鼻子又一次鲜血直流。他掏出手帕堵住鼻血。稍过片刻……他突然放声大笑。

“我把另半边脸转给了他。”他说道。

“这您如何理解？”我问弗洛伊德，他一边呷着香槟一边抽着一支大雪茄。面对骤变的局势，我一时不知所措。

“太有趣了，华生博士，”弗洛伊德喷出一口雪茄烟说道，“太有趣了。”

① 法语，意为“上帝啊！”——译注

术语表

异化 (Alienation)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异化,无产阶级的成员即工人阶级同他们的工作、自身和社会中的其他人之间产生疏离感。从字面上看,该词表示无(a-)纽带或联系(liens)。

失范 (Anomie)

从字面上看,失范表示无(a-)规范(nomos)。它指的是社会规范薄弱或在变动,个体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应该受社会约束。

官僚制 (Bureaucracy)

官僚制的特点是具有长久的、以等级方式组成的职员,受具体而详尽的规章制度控制的权力范围,以及对待作为客体和而非人的个体的手段。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体制这种最为理性的组织形式在现代社会控制了所有的

机构。

魅力 (Charisma)

马克斯·韦伯用在那些因个人品质获取权力的领袖身上的术语。在韦伯看来,权力从传统的(国王)转移到具有魅力的(个人)手中,最终会到官僚制(官僚)手中。

阶级 (Class)

从语言角度来看,阶级是任何具有某种共性的群体。我们常常用来指社会阶级,或更直接地说,是指社会经济地位的阶级:收入和生活方式不同的群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正是统治阶级塑造了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思想。

集体意识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涂尔干所谓的集体意识指的是群体所持的充当其世界观的某种一贯的思想。要了解一个群体,人们必须了解该群体的意识。

集体表现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涂尔干用该术语指人们既是追求自我目标的个体又是受他们可在其中发现自我的群体和社会引导的社会性动物这一事实。从广义上来说,集体表现是反映群体或其他团体信念与理想的文本。

概念 (Concept)

我们可以把概念看作解释或帮助我们理解某个或某些现象的一般思想或观念。

文化 (Culture)

对该术语的定义有数百个。总的说来,文化与具体的思想、艺术、传统信仰、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习俗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防御机制 (Defense Mechanisms)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防御机制是自我用于抵御来自本我或精神中的冲动成分以及良心和内疚这类超我成分的方法。常见的一些防御机制有压抑(把无意识的本能愿望、记忆等排除在意识之外)、倒退(返回个人发展的早期)、矛盾情绪(对某人爱恨交织的感情)和文饰作用(为个人行为开脱)。

越轨 (Deviance)

指个体和群体的价值观、信仰、行为模式和所遵循的法则不同于(背离)既定社会中大多数人。

功能不良 (Disfunctional, 亦作 Dysfunctional)

在社会学思想中,对其所处的实体造成崩溃或不稳

定者可谓功能不良。

二人组合 (Dyad)

齐美尔用来指两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与包括三个成员的三人组合形成(triads)对比。二人组合关系往往具有“无所不有或一无所有”的特征。

有选择的亲和力 (Elective Affinity)

马克斯·韦伯认为,某些相互关联的思想往往在某些时候相互搜寻并且一起造成重要的历史结果。亦适用于似乎相互搜寻的群体。

种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指某些种族群体的成员认为其思想、习俗、信仰和生活方式均优于其他种族群体。

错误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错误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其阶级、地位和阶级发展前途所持的错误思想。这些思想有助于维护现状,对于想避免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统治阶级有很大作用。

女权主义 (Feminism)

女权主义批评家抨击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和男性对

待她们的方式。当代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女性通常都被用作性对象并且在大众传媒文化中定型,这对男性和女性都有负面影响。此外,她们还在工作中遭受剥削和“晋升极限”的压制。

功能替代 (Functional Alternative)

可替代某物之物,就是说它可以取代他物。例如,职业橄榄球可以看作宗教的功能替代。

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在社会学思想中,“功能”指的是一个机构对维护社会现状所做出的贡献。如果有助于维护其所处的体系,它便具有功能。

性别 (Gender)

指个人的性类别:男性或女性,也指与每个类型相关的行为特质。

假设 (Hypothesis)

假设是为讨论、论证或进一步研究的目的而假定为真之物。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用来解释某种现象的猜测或假定。

理想范型 (Ideal Type)

马克斯·韦伯的概念,指并不存在却可用作分析工具的想象的极端之物。他认为,理想范型包括“对现象中成分的片面夸大和强调”,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解和有助于理论的形成。

意识形态 (Ideology)

意识形态指的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一致而完整的解释,有助于为某个群体或政治实体树立目标并指导其行动。

隐性功能 (Latent Functions)

隐性功能指的是某种活动、实体或机构隐蔽的、未认可和非预期的功能。社会科学家把它们与认可和预期的显性功能相对比。

生活方式 (Lifestyles)

从字面上看,表示生活的方式。指的是人们生活的方式,即他们如何装饰公寓或住宅(以及他们居于何处)、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光顾什么样的餐馆、去何处度假等。

显性功能 (Manifest Functions)

某种活动、实体或机构明显而有预期的功能。显性功能与隐蔽功能和非预期的功能形成对照。

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认为社会和经济状况而非思想造就了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社会。

机械聚合 (Mechanical Solidarity)

涂尔干的术语,指“社会成员所共有的思想和倾向在数量和强度上大于从属于个体成员의思想和倾向”的社会。也就是说,个体差异往往会减少到最低限度,不同于个体差异占主导的有机聚合社会。参见“有机聚合”。

模型 (Model)

在社会科学中,模型用来抽象地表现某种现象的运作过程。理论往往用语言来表达,而模型往往用图表或者通过统计学或数学方法来表示。在《大众传播研究的传播模型》一书中,丹尼斯·麦奎尔和斯文·温达尔把“模型”定义为“对一则事实用图表形式有意简化的描述。模型试图展示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成分以及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

无功能 (Nonfunctional)

在社会学思想中指既没有功能也不属于功能不良者,对其所处的实体没有作用。

有机聚合 (Organic Solidarity)

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际纽带不如在以机械聚合为特征的较原始社会中强大牢固。有机聚合的基础是人际差异,是现代工业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

新教伦理 (Protestant Ethic)

马克斯·韦伯认为,正是“世俗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引发了宗教原则和宗教戒律从世俗内向外部世界的转移并且认为积累财富光荣,因此促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精神分析理论 (Psychoanalytic Theory)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具有所谓的“无意识”,与意识和前意识不同,一般来说我们难以接近它,但它却在持续不断地造就和影响着我们的精神活动和行为。这就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我们可以用冰山来做比:露出水面的冰山顶代表着意识,水下可见的部分代表着前意识,冰山的其余部分(大部分不可见,但我们知道它存在)代表着无意识。由于压抑,我们难以接近这部分精神领域。

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地形”假设。弗洛伊德还强调了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对个人生活的作用。他还提出“结构”假设,把人的精神分为三个部分:本我(人的内驱力的精神表现),自我(帮助个人应付外界)和超我(内疚、良心、道德戒律)。

种族 (Race)

种族的定义很不统一。传统上认为与遗传性的体质特征有关,近年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种族是一个社会概念,也就是说种族是由文化定义的概念。

相对主义 (Relativism)

在哲学思想中,相对主义表示相信真理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在伦理思想中,相对主义指的是没有绝对的道德和伦理准则。因此,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它们都同样有效。也就是说,道德和伦理行为是相对于特定群体的,不能扩大到全人类的范围。这迥异于那种认为存在着可以并应该适用于每个人的绝对伦理标准或普遍行为模式的观念。

角色 (Role)

角色是我们从社会中学到的并适用于特定环境的一种行为方式。一个人在特定的一天一般要扮演许多角色:如父母(家庭)、工人(工作)等。

统治阶级 (Ruling Class)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由相互冲突的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其思想支配着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思想。

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s)

社会控制是指人们从社会中获得并造就其观念和信仰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和习俗。人不仅是具有一些不同的身心特征和欲望的个体,同时还是社会成员。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受所处社会的影响。

社会事实 (Social Facts)

涂尔干把社会事实定义为“能够对个体施加外在约束的固定或不固定的每一种行动方式”。这些约束作为道德准则融入人们的意识并且有助于塑造其行为。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可以定义为不同类型的互动,这意味着社会学成为对不同情境和环境中的互动的研究。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该术语指的是社会教会个体如何行事处世的过程:

遵守什么法则、承担什么角色和持有什么价值观。传统上,社会化是双亲、教育者、宗教人物和同龄人所造就的。如今,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篡夺了这一功能,其结果并非总是积极的。

社会性 (Sociation)

社会性指的是人们形成群体和互动的方式。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言,“社会学质问的是人自身的事及其行为规则,所涉及的不是他们在整体中如何展现其可理解的个体存在,而是他们如何形成群体以及由于互动群体存在对他们的决定作用。”

社会学理论 (Sociological Theory)

社会学理论试图系统而有逻辑地解释和预言社会行为。理论有用以定义某些被研究的现象(如失范)的不同概念,也有抽象的、常常用图表来清楚表示研究对象的不同模型。正如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学理论”指的是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现象——一般来说即群体中人的行为所提出的思想和阐释。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表明,社会学思想未必与具体研究相脱离。

社会学 (Sociology)

社会学可定义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研究。它是一门试图描述、理解和预言人类群体行为的社会科学。

刻板模式 (Stereotypes)

刻板模式是人们对各类人广泛持有的、过于简单并且一般不准确的群体模式。这些刻板模式可能是积极的、消极的或二者兼有,但一般都是消极的。刻板模式的形成往往与大而化之、泛泛而论有关。(人们认为墨西哥人、中国人、犹太人、美国黑人、特权白人、美国人、律师、医生、教授等具有某些特点,往往是一些消极的特点。)

亚文化 (Subculture)

亚文化是指在宗教、族群、性定位、信仰、价值观、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强势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亚群体。在任何复杂的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亚文化是正常的事。

自杀 (Suicide)

从字面上看,该术语表示杀害自我(sui 即自我,side 即杀)。它指的是自愿、有意结束自己的生命。涂尔干的研究表明,自杀具有不同的类型:利己主义型、失范型、利他主义型和宿命论型,自杀率与既定社会现存的聚合和整合程度有关。

价值观 (Values)

价值观是抽象的,而一般的信仰或对是非善恶的判断。价值观关系到个人行为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实体。

从哲学视角来看,价值观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人们如何判定价值观孰对孰错、孰好孰坏?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证明价值观的正确性?其次,当持有不同价值观的群体间发生冲突时怎么办?

参考书目

- Adams, Bert N., and R. A. Sydnie. *Sociological Theory*.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2001.
- Berger, Arthur Asa. *Essentials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5.
- . *Postmortem for a Postmodernist*.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Press, 1997.
- . *The Mass Comm Murders: Five Media Theorists Self-Destru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 Berger, Peter, and Brigitte Berger. *Sociolog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
- Burns, Elizabeth, and Tom Burns, eds.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nd Drama*. Baltimore: Penguin, 1973.
- Chinoy, El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2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 Coleman, James S., and Deepak Lai.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oser, Lewis A.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Idea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 Du Bois, W E. B. *Black Folk, Then and Now*. Millwood, N.Y.: Kraus-

- Thomson, 1975.
- Durkheim, Emil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J. A. Spaulding and G. Simp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2.
- . *Moral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 .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 Freud, Sigmun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 New York: Boni and Livertight, 1921.
- Frisby, David, and Mike Featherstone. *Simmel on Culture*. London: Sage, 1997.
- Gerth, H. 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Hansen, Donald A. *An Invitation to Critical. Sociology: Involvement, Criticism, Explor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 Hughes, H. Stuart.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 - 1930*. New York: Vintage, 1958.
- Jenks, Chris, ed. *Care Sociological Dichotomies*. London: Sage, 1998.
- Larson, Calvin J. *Major Theme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3.
- Lenin, Vladimir.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32.
- .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37.
- Park, Peter. *Sociology Tomorrow: An Evalua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Terms of Science*. New York: Pegasus, 1969.
- Rickman, Jonathan, ed. *A General Selection from the Works of Sigmund Freud*. Garden City, N. Y.: Anchor, 1957.
- Ritzer, George.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 . *Classic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9.

- Ruitenbeek, Hendrik M., ed. *Varieties of Classic Social Theory*. New York: E. P. Dutton, 1963.
- Shils, Edward, and Henry Finch, eds. *Max Weber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 Simmel, Georg. "Adornment." In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Kurt H. Wolff, 338 - 344.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0.
- . "The Poor" Translated by Claire Jacobson. *Social Problems* 13, no. 2 (fall 1965): 118 - 139.
- . "Money in Modern Cultu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8, no. 3 (1991): 17 - 31.
- Thompson, Kenneth, and Jeremy Tunstall, ed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1.
- Volosinov, V. N.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Translated by I. R. Tituni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ebb, Beatrice.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ume 3 1905 - 1924: The Power to Alter Things*. London: Virago Press, 1984.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1958.
- .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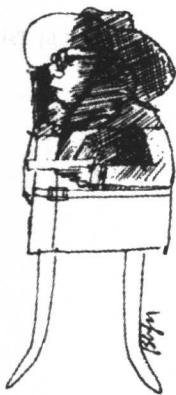
Selected Works by the Theorists Depicted Herein

- Du Bois, W E. B.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Chicago: A. C. McLung, 1903.
- .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

- . *John Brow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1.
- Durkheim, Emile.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938.
- . *Suicid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1.
- .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 Freud, Sigmund. *Totem and Taboo*.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W. W. Norton, 1913.
- .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1.
- .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lated by J. T. Riviere. London: Hogarth Press, 1930.
- Lenin, Vladimir.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32.
- .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37.
- . *What Is to Be Don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39.
- Simmel, Georg.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Kurt H. Wolff.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 .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Kurt H. Wolff.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 . *Simmel on Culture*. Edited by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 London: Sage, 1997.
- Webb, Beatrice. *My Apprenticeship*.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ume 3 1905 - 1924: The Power to Alter Things*. London: Virago Press, 1984.
- .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Ashgate, 1987.

- Weber, Max.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 .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49.
- .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1958.

作者介绍



自1965年起,阿瑟·阿萨·伯格任州立旧金山大学广播与电子传播艺术教授。1954年,他毕业于马萨诸塞大学,主攻文学与哲学。1956年,他在衣阿华大学获得新闻与创作硕士学位。毕业不久,他应征入伍,在华盛顿市的美军华盛顿军区服役,任军区公共信息部的特写作家与演讲稿撰写人,他还为《华盛顿邮报》的周末晚报撰写中学体育报道。

退役后,伯格旅欧一年。1965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获美国研究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连环漫画《利尔·阿博纳》。1963年到1964年,他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

前住意大利,在米兰大学任教。1984年,他在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能伯格传播学院做访问教授。2001年冬,他曾作为富布莱特高级专家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海因里希·海涅大学任教。

他撰有大量文章和书评,著作涉及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幽默和日常生活。近期著有《传媒分析技巧》、《传媒研究技巧》、《喜剧写作艺术》和《电子游戏: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他的著作已有德语、瑞典语、意大利语、韩语、印度尼西亚语和中文译本。迄今为止,他已到十多个国家作过演讲。

伯格已婚,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孙子,居于加利福尼亚的米尔山谷。他的妻子在迪亚布洛谷学院教授哲学。他爱好旅游,喜欢在民族餐馆用餐。

他的电子邮箱是 abberger@sfsu.edu。

译后记

有一天,在西门子公司任职的大学同窗好友告诉我:闲暇时喜读恐怖小说之类的英文书,发现不少中译本很不理想,问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为何不译一些好看的东西与大家共享。我沉吟良久,向她解释说:忙了很多年的学位、职称还有孩子,虽译事不断,几乎是清一色的学术理论文章,但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促成此事。

又一日,我向英美文学教研室的同仁好友转述了那次对话,倡议联手搞一个翻译工作室,想方设法挤出时间专门共同翻译一些喜闻乐见的作品,因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算不上什么科研成果也不能用来评职称。没几日,李永毅收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陈凌云先生的邀请函,信中说有三四本伯格的小说要找理想的译者,因为小说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有一定的难度。经过商议,李永毅决定接手《哈姆雷特谋杀案》,蒋虹意在探索《学术会议上的惨案》,我则有幸译这本《涂尔干死了!》,另一位好友范圣宇因忙于赶写博士后出站报告,很遗憾未能加盟,说好下回一个都不能少。

就这样，我们共同迈出了第一步，也是对我个人意味深长的一步。

20年前，我的父亲母亲经过十年两地分居、八年冷战之后终于各奔东西，我这个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文学少年只好辍笔，潜心准备高考。填写高考志愿时，经反复掂量，放弃了深爱的中文，报了好找工作的英语专业。大三时我正准备报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又被保送上了研。三年之后，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准备报考文艺学方向的博士生，不巧相关导师正在国外，于是就进了外语系教书，以免坐吃山空。又过了三年，我终于师从罗钢先生在中文系攻博，圆了少年时代的中文梦。然而，还有一个梦，一个缠绕了我20年挥之不去的梦。

诚如弗洛伊德所言：“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他人始终作为榜样、对象、助手或对手而参与其中，因此从一开始个人心理学就同时又是社会心理学。”记得，博士论文快写完的时候，我在一次聚会中当着众师兄的面对罗老师说：“在论文做得最艰苦的时候，我每次做噩梦准梦到您。”素以和善著称的罗老师为之骇然，百思不得其解。但从此以后，我彻底摆脱了那个梦境。

20年前，我对家庭温暖的渴慕、对文学的憧憬以及对一个男孩的痴情或曰单相思几乎在同一时刻被击得粉碎，有大半年的时间我自闭在家中读英文小说。是英文小说领我走进阳光地带，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翻译工作则使我得以在钟爱的中文和英文之间筑路搭桥、

穿梭往返。蓦然回首,我看到了自己的使命,于是有了一个目标:译完 10 本小说之后,我要开始写小说。而这本书,是我译的第一本小说。

在那个 20 年挥之不去的梦中,淡月昏黄,秋叶四起,男孩的侧影萧瑟阴郁,最终是远去的黑色背影,我茫然不知所措,唯有掩面踽踽而行。

曹雷雨

2005 年 1 月 11 日